
鸦片战争
陈舜臣说晚清历史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东西方文明的
激越碰撞
[日]陈舜臣 著
海墨 译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第一章 衰世
- 倾斜的时代
- 离京的诗人
- 宣南诗社

第二章 午睡之友
- 畸形的通商
- 罂粟之妖
- 漏银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
- 夷馆
- 公行
- 走私贩运
- 英国更换代表
- 律劳卑的失败

第四章 论争
- 广东之梦
- 许太常奏议
- 驳斥弛禁论
- 严禁论的定本

第五章 点火
- 皇帝奋起
- 林则徐出场
- 事势有难言者
- 林则徐南行

第六章 虎门销烟
- 实权的行使
- 天之所厌
- 烟深海国
- 权臣在内

第七章 战火
- 驱逐

- 从九龙炮击到穿鼻之战
- 北京和伦敦的强硬态度
- 英国的动员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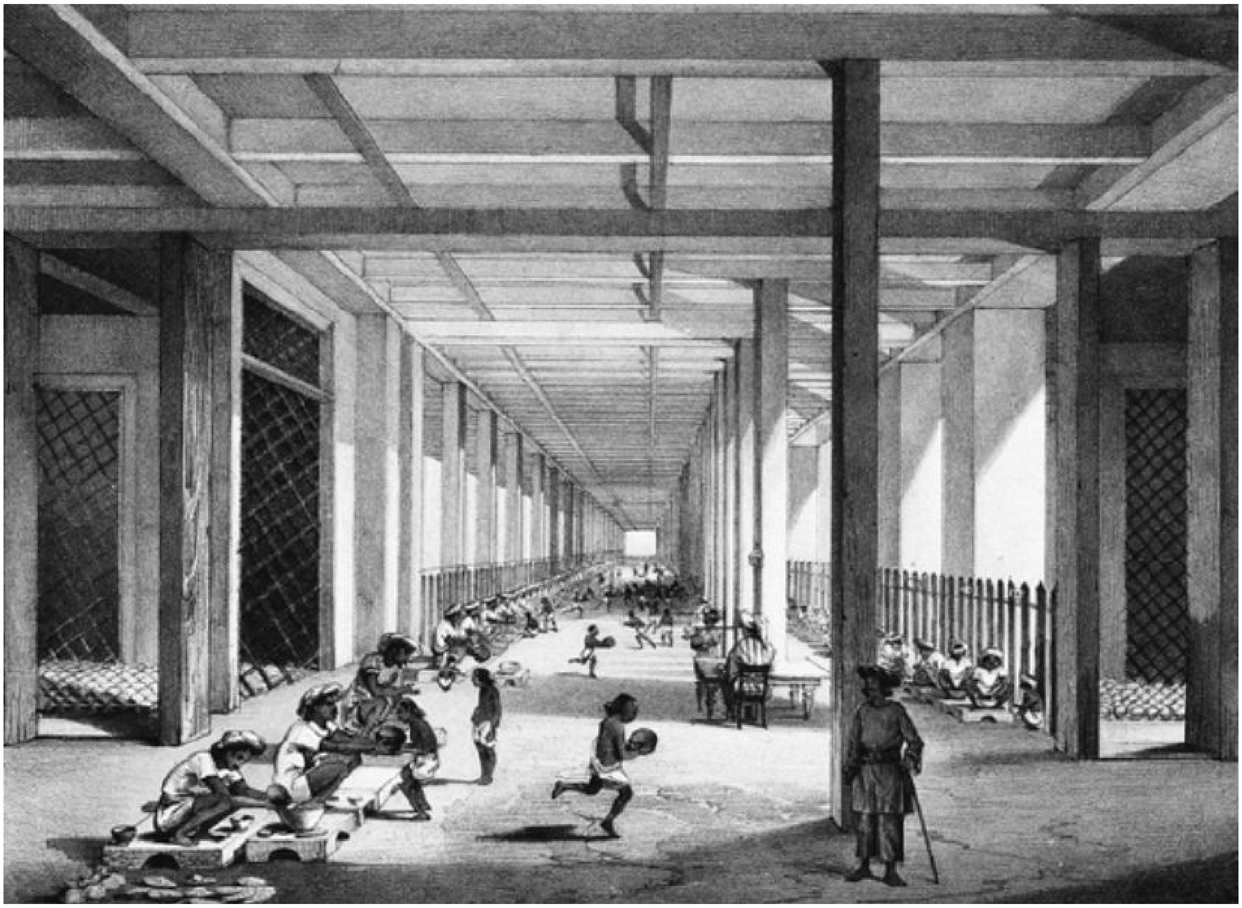
第八章 为了鸦片

- 远征军北上
- 重返广东
- 南方与北方
- 不义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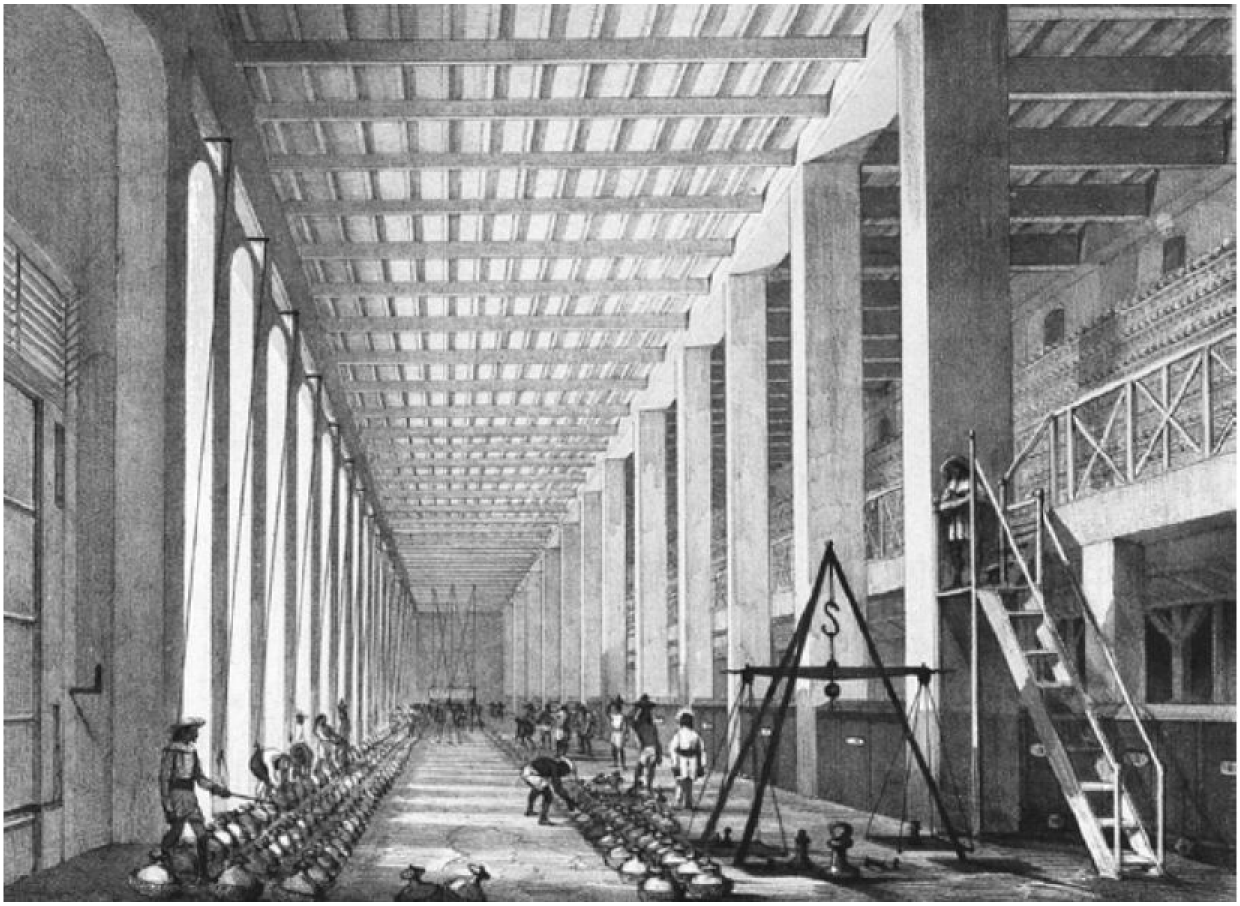
第九章 三棱镜时代

- 星斗南
- 渔翁得利
-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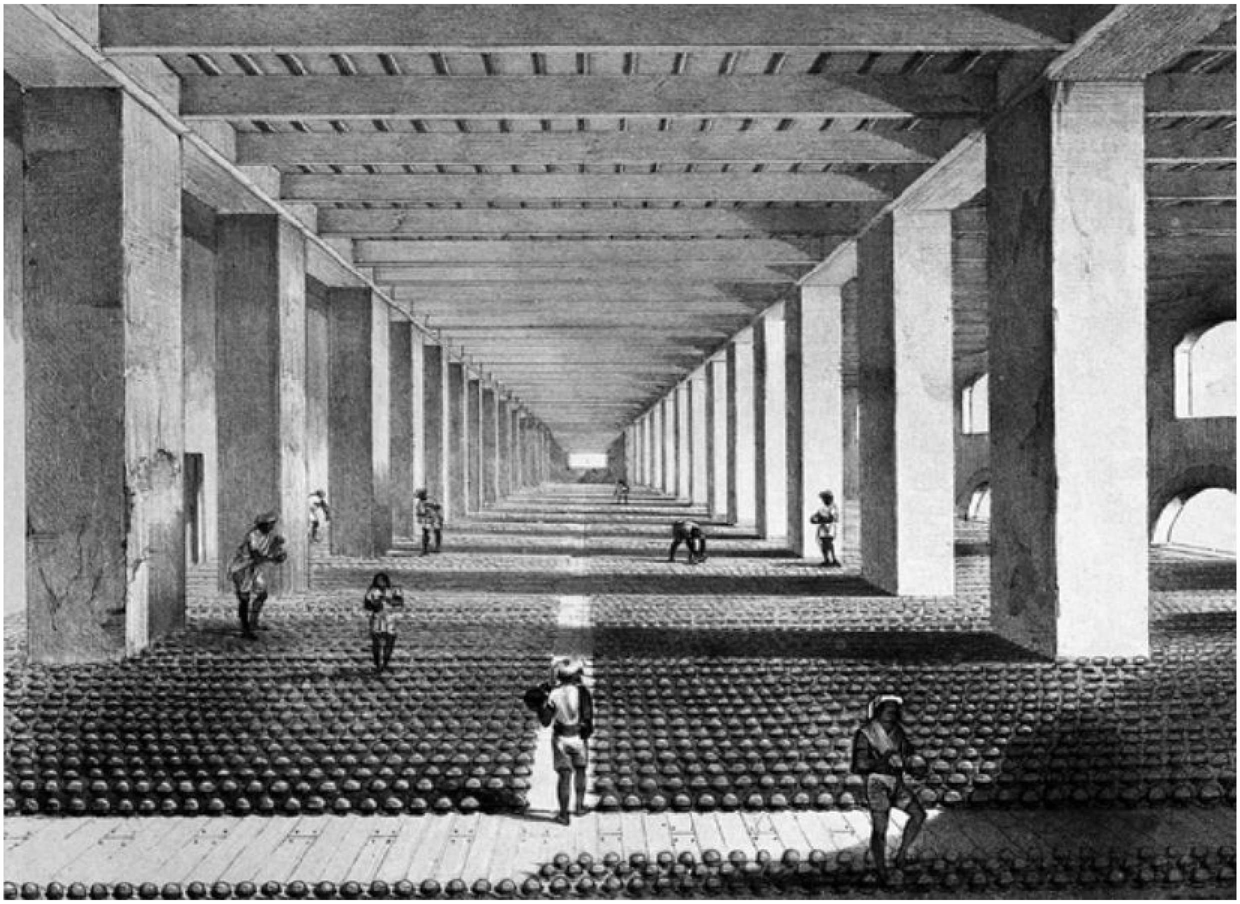
印度巴特那鸦片工厂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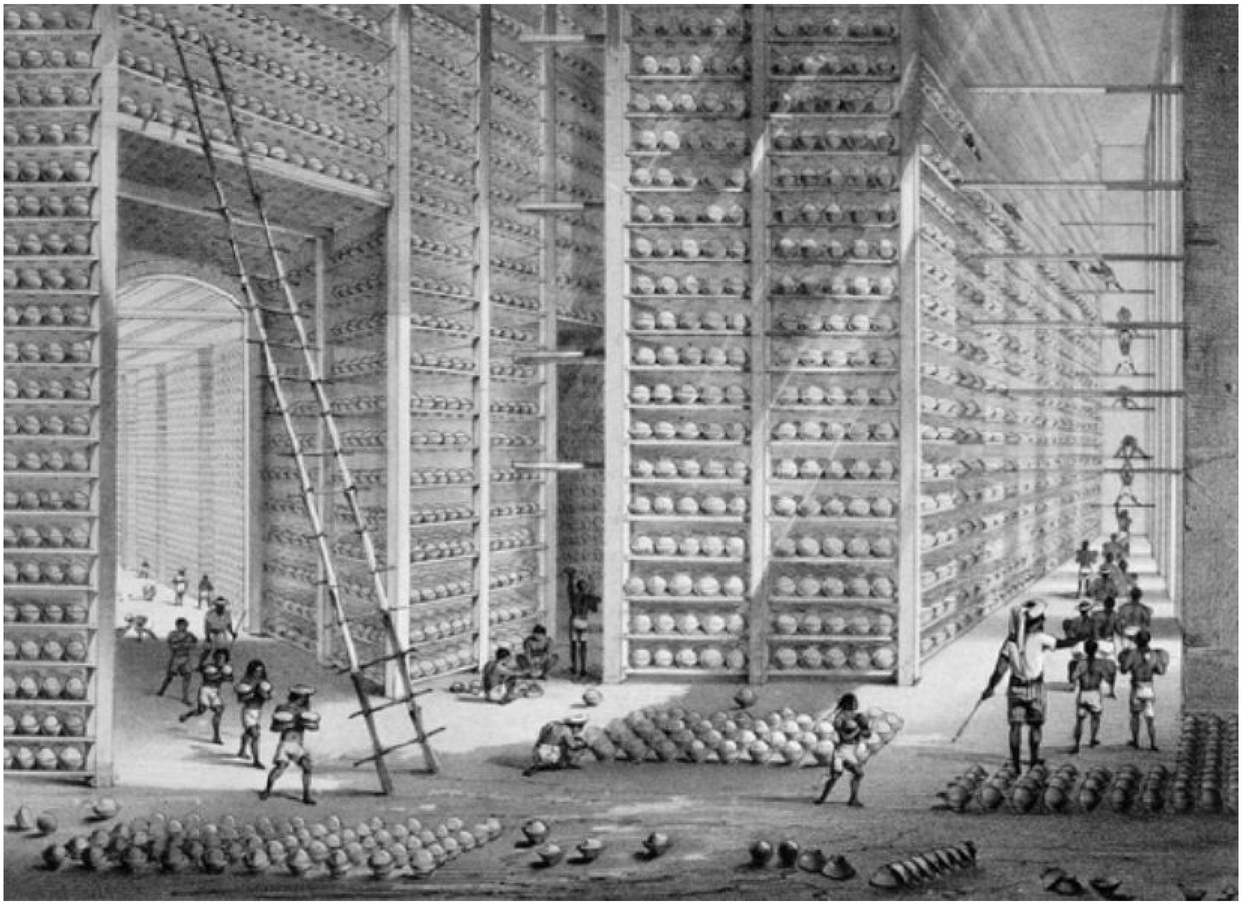
鸦片制造厂



繁忙的检查大厅



干燥室



鸦片储藏室

第一章 衰世

倾斜的时代

先说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在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则是天保十一年。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清世祖顺治登基（1644年）算起，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六年，而距离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年）还有七十一年。[1]

就年号而言，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是明治，用了四十五年。不过，1971年已经是昭和四十六年了，刷新了这个纪录。

就中国历代而言，使用时间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个，一个是康熙，用了六十一年（1662~1722年）；另一个是乾隆，用了六十年（1736~1795年）。使用年限在四十年至五十年之间的，有明朝的万历和嘉靖，分别是四十八年（1573~1620年）和四十五年（1522~1566年）。

汉武帝在位近五十四年（前141~前87年），但他喜欢改年号，从即位时的“建元”到驾崩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没有一个年号的使用时间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将近四十四年（712~756年），用了三个年号，“先天”用了一年余，“开元”用了二十

九年，“天宝”用了十五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2~1063年），在位期间用了九个年号。

皇帝要想在位时间长，不仅寿命要长，还要在年轻时就即位，而且必须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时间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

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能力往往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理想的状态是：皇帝年轻时登基，朝气蓬勃地革新政治，随着其思想的成熟，治国手段也逐渐老练。不过，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间，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皇帝少之又少。

上述各年号使用期间，除了明朝尚待商榷，大体上都可谓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康熙和乾隆，前后各六十来年，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前后一百三十余年，说它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想必没有人会提出异议。雍正年间虽不是朗朗盛世，却把两个长达六十来年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起来。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但仍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三代可以概括为：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发散。

乾隆皇帝发散的手法相当大方。镇压新疆回部之乱[2]、平定台湾林爽文事件[3]、平息各地苗族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军费支出上可谓大手笔。接着，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投入了巨额经费。歉收之年，他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少从乾隆皇帝的挥霍手法来看，这么认为不无道理。

不过，即便是英雄，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力也都会衰退。乾隆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下谕旨，说自己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就退位。下旨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如预定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四年后驾崩。

乾隆认为八十五岁是自己的极限，这其实是出于帝王的过度自信。事实上，极限早已到来，政治早就开始紊乱，只不过是被“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掩盖了而已。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一死，其宠臣和珅就被处死，据说，和珅被没收的财产超过八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为七千万两白银。

允许这样一个宠臣存在，本身就说明，乾隆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继乾隆之后，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断遮掩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使得整个国家漏洞百出。不过，嘉庆年间勉强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之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算是平安度过了。

嘉庆之后即位的是道光皇帝。这时已经不是衣服有破洞这么简单了，而是肉体上的千疮百孔导致积年的脓血横流。正是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鸦片战争爆发了。

据《皇朝通典》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人口约为一亿九千零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1830年），《户部档案》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但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了百分之十八。也就是说，人均耕地减少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增加应当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2] 即大小和卓之乱，指乾隆二十二年新疆地区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发动的叛乱。
[3] 指乾隆五十一年由天地会领袖林爽文发动的一场抗清运动。



乾隆皇帝朝服像

---

[1]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下诏退位。
[2] 即大小和卓之乱，指乾隆二十二年新疆地区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发动的叛乱。
[3] 指乾隆五十一年由天地会领袖林爽文发动的一场抗清运动。

离京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一位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离开了北京。

他叫龚自珍，号定盦[1]，出生于仁和（今浙江杭州）。他的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官。龚自珍自幼跟着外祖父学习《说文解字》。总之，这位诗人的成长环境是相当优渥的。

龚自珍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听到黄昏时如咽如泣的唢呐声，竟会昏倒过去。一直到壮年，这个怪毛病仍如影随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里得到考据：

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2]

这年四月，他只身离开了北京，回到故乡杭州。同年九月，他又回到北京接家属，不过并没有进入北京城内，而是在郊外的固安和家人会合。

他似乎是在避人耳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传闻，当时他与皇族的爱妾有染；后来东窗事发，他担心继续留在京城有危险，于是逃离京城。传闻中的女主角就是当时有名的才女顾太清[3]。

顾太清的词比诗更胜一筹。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适于表达个人情感。顾太清的词不拘泥于格式，自由而奔放，是得到公认的。这些都表明她是一个热情的人，不喜被陈腐的规则束缚。龚自珍也是个热情的人。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文才绝世，而且都生活在京城，确实有可能在某种机缘下相遇相知。

传闻是真是假、诗人匆忙离京是否与顾太清有关，这些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他的离开很蹊跷。

龚自珍神经极其敏感，只要轻轻一触，就会出现极大的波动。这种敏感使他自己都感到害怕。当情感实在难以抑制时，他就会破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立誓不再写诗。龚自珍情感炽烈，一旦写起诗来，就更难以抑制，因此，他把写诗看作和喝酒、抽烟一样的恶习。然而，他三次戒诗，又三次破戒。他的情感就像洪水泛滥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只有写诗才能加以引导疏通。

在两次往返北京与杭州的途中，龚自珍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因1939年是己亥年，故统称《己亥杂诗》。诗中多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他对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当时的有识之士，或多或少都会为国家的衰落而担忧。龚自珍也深切地体会到了衰世的来临。

中国人是极尊重历史的。这跟印度人看重宗教截然不同。印度人更关心对宗教的思索，文献记载的也多是跟宗教有关的内容，所以有人说，印度的史料往往是不足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丰富而全面，且大多是对历史的记录。在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中，像龚自珍这样敏感的诗人，会对时世的衰落反映得更为深刻。

龚自珍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

世间恒定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一直纠缠着我。春意盎然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夜里入眠时，它最先进入梦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它都不曾改变。谁像我这样多情啊？尽管它纠缠不休，我还是不忍心借巫蛊之术来驱赶它！

这样的忧患之情，在当时的文人中普遍存在，但龚自珍表现得更为炽烈。

途中，他经过镇江时，恰好赶上当地的庙会。当时民间推崇道教，崇拜玉皇、风神、雷神等神仙。按照道教的教规，先把对神仙的祈求写在青纸上，即所谓的青词，然后供在神像前。庙会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一位道士请龚自珍写一篇青词。

一提到求神，龚自珍的忧患之情就更强烈了。“祈求神灵？求什么好呢？”他暗自揣度，最后作了下面这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九州即中国。中国要重拾生机，需要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然而眼下，朝野臣民都噤口不言，连马都不叫了，如此沉闷，实在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奋精神，不要拘泥于常规，多降一些有用之才吧！

龚自珍渴望英雄出世。这也是近代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与其依靠神灵，不如寄希望于人才。但是与其等待英雄出世，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对于离开京城一事，龚自珍心里是惭愧的。他思念京城的友人。尽管就诗文来说，他们当中没人能超过自己，也算不上“破格”的人才，但至少都在对“天下”发挥着作用。“只有我落到如此境地……”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与衰世休戚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能准确地描述它。他希望通过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激发人们的热忱——不仅是当代的人们，还有后世的年轻人。而这也是这位落魄诗人逃离京城后唯一的心灵慰藉。

确实，清末的革命志士，几乎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来自其思想体系，而是源于其作品的鼓舞性。思想不成体系，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龚自珍本质上是个诗人，要他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个无理的要求。

同时，他的文章也有过激和奔放的一面。对此，不少人持批判态度，尤其是崇尚正统的古文学派和反对过激思想的改良主义派。

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在《说林下》中评价道：

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

改良派对其也不乏类似的评判。近代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写道：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即便如此，龚自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也没有丝毫的衰减。

龚自珍和魏源齐名，两位都是公羊学派[4]的健将。但在我看来，对龚自珍的诗歌才华，应当给予更高的评价。他的才华源于他的直感能力。因此，他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而是个敏感的诗人。这种敏锐的直感能力，甚至使他有了预言家的特质。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从龚自珍讨论起，但这不表示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历史上的人物大多沾时代的光而显赫一时，只有少数人会凭自己的力量实现时代的辉煌。龚自珍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他的作品勾勒出了鸦片战争时代的轮廓，甚至预言了后世。

龚自珍在《尊隐》中写道，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中，京城“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而城外“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大意是：在这个日渐衰落的时代，京城的人们冷漠孤立，苟且偷生；山中之民则一呼百应，即将蜂拥而来。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篇文章预言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这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也许龚自珍本人并未察觉到，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确实给予后世某种启示。

镇江庙会上人潮涌动，龚自珍走在其中，脑海里接连闪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那些人的面容。他想起白发皓首的阮元，那个曾当过两广

总督的知名学者。当时阮元已经功成名遂，正隐居在扬州。龚自珍拜访过他。他们谈论了很多经学上的问题。《己亥杂诗》中曾提及此事：“谈经忘却三公贵。”当时他们谈得入了神，龚自珍甚至忘记了对方是个身份显赫的高官。

接着，他想起另一个人—— 林则徐。林则徐给他的感觉跟阮元截然不同。彼时林则徐已接任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朝廷派给他的任务是禁绝鸦片的走私进口。这事很难，但必须得做。

一想到林则徐，龚自珍的脑海里就如走马灯般，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宣南诗社友人的面容。“多么可贵的友谊呀！”他陶醉在美好的回忆里，以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再次流下了泪水。

---

[1] 一作定庵。

[2] 出自《冬日小病寄家书作》。

[3] 字梅仙，满族，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位辅国将军的母亲。她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天游阁集》等。

[4] 儒家经学中专门研习《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在晚清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无不写诗。诗作之于中国的读书人，就像短歌[1]及俳句[2]之于日本的读书人。不过，在日本真正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在中国，只有那些能写出极优秀诗篇的人才称得上诗人。中国没有诗人这一职业。诗人大多当过官，如杜甫、李白、白居易等。陶渊明辞官后，回归田园，以耕田种地维持生计，而不是靠写诗糊口。

诗是情感的抒发，是诗人对人与自然的观察，本质上体现了一种表现欲—— 诗人希望有人读到自己的作品，并给出意见，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写诗是摆脱孤独的一种手段。诗人们倾向与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创作，于是就产生了社团。

龚自珍当时参加的是宣南诗社，同人大多推崇“公羊学”。所谓公羊，是专门注解孔子所编的《春秋》的典籍之一。这种对“经”的解释，被称为“传”。对《春秋》的解释有《公羊传》《左传》《谷梁传》。其中，就内容的翔实度来说，《左传》最杰出，《公羊传》则着重说明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的史实铺叙中，隐含着深刻的用意和对历史的批判。

中国自古以来，“华夷之辨”的观念就根深蒂固。“华夷”即文明与野蛮。以《春秋》为例，在谈及文明国家时，一般加上“人”字，如“齐人”“秦人”等；说到野蛮民族时，通常不加“人”字，仅以“夷”“狄”“戎”等相称。如《左传·僖公·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给“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则不加“人”，这是遵循了一般的惯例。秦虽是文明国家，但在战争中罔顾人道，于是被《春秋》

纳入夷狄之列而没有加“人”。相反，野蛮民族若有善行，有时也以“人”相称。

公羊学派很看重对史实的记述常隐含激烈的批判思想这一点。随着历史批判精神不断增强，这种学风必然会染上政治色彩。因此，公羊学派的学者一般是先从历史开始批判，继而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分析和批判。他们对行政组织形式、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方面，表现出深切的关心，不时予以评论。

朱子学在宋代形成完整的体系，一直被奉为正统学问。朱子学注重对文献的批判，由此产生了像南宋王应麟[3]那样的考据学者。明清因袭此制，也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清代，考据学成了主要治学方法。可以说，清代的学问就是清一色的“考证”。考证需要具备严格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从这一点看，考据学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可惜的是，这门学问最终还是沦落到为考证而考证的地步。一味地考据，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于是乎，他们开始转向对批判现实政治的公羊学的研究中。不过一直到清末，公羊学都未能取而代之，成为学问之主流。

刘逢禄[4]是当时公羊学派的泰斗。龚自珍和魏源是他的门生，同时也都是宣南诗社的成员。诗社同人还包括同为禁烟先驱的林则徐和黄爵滋。

据《龚自珍年谱》所载，道光十年（1830年）四月初九，于花之寺会诸友，共赏海棠。组织这次聚会的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参加者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共十四人。想必在这次聚会上商谈了结社事宜，因而五月宣南诗社就诞生了。

《魏源年谱》中记载了五月的聚会。当时参加聚会的除了上述人员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他们成立了宣南诗社。

此外，六月初二，龚自珍邀约同人，于龙桥寺举行酒会。当时适逢公羊学派泰斗刘逢禄过世的第二年，因此，会上很可能商议了关于

刊印恩师遗稿的事宜，并最终决定由魏源操办此事。

林则徐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花之寺的聚会。因为当时他在福建老家为父亲服丧，四月才回京。同人赏花时，他可能还在回京的路上。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时的英才，其中既有“公羊学双璧”龚自珍和魏源，又有林则徐、黄爵滋等朝气蓬勃的官员。不难想象，他们会谈论关于“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一定得想想办法呀！”

“有什么办法呢？”

或许，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改变现状的策略——摒弃抽象的言辞，切实地考察实际情况。这体现了公羊学的特点。

下面是结社时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服丧。此前，他曾任江宁布政使。此后离开北京，任湖北布政使。当时的巡抚是各省长官，掌管一省军政和行政。巡抚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行政和财政工作，后者负责司法工作。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考上进士。他因不愿就任知县而继续留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从七品。林则徐当时是从二品。

魏源，三十七岁。诗社成立时，作为公羊学者的魏源已经有很大的名声了。不过，他在五十一岁时，也就是诗社成立十四年后才考上进士。

黄爵滋，三十八岁，任翰林院编修。道光三年（1823年），黄爵滋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就任编修。编修一职虽仅为正七品，但也是他平步青云的垫脚石，保障了他的远大前程。

进士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入翰林院，其他人则被任命为知县。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开科取士后，林则徐列居放榜单中第二甲

九十二名进士中的第四名，他因成绩优秀进入翰林院。而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成绩并不优秀。

在诗社成立时的同人中，有资格向皇帝上疏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只待了三个月就去湖北了。因此，宣南诗社的同人虽大谈政治，但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诗社中不过是进行政论的交流，或练习写奏疏。

当时选拔官吏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乡试及格者即为举人，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及格者为进士。参加会试的举人有上万，而进士只有两百人左右，可以想象这道关隘之艰难。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长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 除了通晓四书五经，重点是书写工整。“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可见，当时对书写的重视甚至高过对文章本身的关注。很多当时的文章都记载了这种情况，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中有云：“近数十年，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又云：“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

考生和官员都把注意力放在书写是否工整上，即使一点一画也不能疏忽大意。至于策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楷书写得不工整的人，即使文章写得再优秀，也很难考中进士。

作为学者，魏源和龚自珍都要胜过林则徐。但在官场上，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进士，而魏源和龚自珍都较晚，且二人的成绩都达不到进翰林院的标准。从龚自珍和魏源留下的笔迹来看，他们的字虽不是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说不上工整。

科举考试偏向于像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重视正统的考生，对龚自珍那样感性、具有艺术家性格的人来说，则是一道难以跨过的坎儿。人们渴望的“破格的人才”，首先就会被刷掉。因此，道光年间的政界可谓“恹恹无生气”。

中了进士的人，终生都把当年主持会试的考官尊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的进士，考官正是曹振镛。从林则徐的日记可以看出，

他一直衷心效劳这位老师。

当时的派系，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这种偶然因素来划分的，和思想或抱负的关系不大。但宣南诗社的成立不是出于偶然。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相似的观念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社员中数黄爵滋升官机会最大。同人都鼓励他："努力升官，这样才有资格上奏疏。"

在封建社会，官员们的所谓"政治"，就是呈递奏疏，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时林则徐已经具备上奏疏的资格。同人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即使在他离开北京去湖北之后，同人谈论问题时，还是会提到他：

"希望林公也能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是林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在野人士或品级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想法反映到朝堂之上，只能通过高级官吏代为转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则徐是宣南诗社的寄托。

---

[1] 一种传统的五句定型诗，共有三十一个音节，格式为五-七-五-七-七。

[2] 由十七音组成的定型短诗，格式为五-七-五，由中国古代的绝句发展而来。

[3] 字伯厚，宋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南宋末年的经史学者、教育家、政治家，著作颇丰且学术价值极高，擅长考证。

[4] 清代经学家。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礼部主事。

第二章 午睡之友

畸形的通商

为了遏制天主教势力，日本在德川时代[1]曾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也实行了此政策，但主要是出于“华夷思想”。

英国对与中国的贸易十分热心，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派乔治·马戛尔尼来北京，名义上为了庆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实际则是为了与清政府谈判改善通商。

清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乾隆皇帝托马戛尔尼勋爵将一封写着“咨尔国王”的敕谕带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信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意思是：我们天朝物产丰富，应有尽有，本来就不需要与外国通商，互通有无。同时，他还认为，外国缺乏茶叶、瓷器、蚕丝等日常必需品。他们乘船来中国，是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天朝是基于“加惠远人，抚育四夷”的慈善精神才同意通商的。这是一种单方面的施恩思想，缺乏通商所需的平等互惠的基本精神。

从当时的交易情况来看，清朝进口的确实大多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出口的则是茶叶等欧洲人的生活必需品。

十六世纪初，通过海员和传教士，茶被传到了欧洲。起初，茶在药店中被当作贵重药品出售。后来，饮茶的习惯逐渐普及，尤其是在

英国，进入十九世纪后，茶休[2]已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茶叶的需求量猛增。

当时，中国是茶叶的唯一供给地。英国在很多年后才开始在阿萨姆[3]和锡兰[4]等地种茶。因此，当时的英国不得不高价从中国进口茶叶，可是又没有合适的出口商品以实现贸易平衡。英国的重点出口商品是毛织品，不符合中国人的喜好，因而销路不畅。钟表、望远镜等商品，正如乾隆皇帝在敕谕中所说，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于是，通商演化成了“畸形贸易”—— 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由于缺乏合适的出口商品，英国不得不以现金支付。于是，英国的商船带着墨西哥银圆和西班牙银圆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后返航。

在此说一说清朝的货币制度。

清朝采取银本位制。商品的价格是以“银多少两”来表示的。

“两”是重量单位。以“银十两”为例，既可以用一个十两重的银锭，也可以用五个二两重的碎银子。政府基本不铸造银币，因此无论是扁圆形的银圆，还是球形的碎银，或马蹄形的银锭，都是可以的，只要纯度和重量符合规定即可。

事实上，清朝也铸造过银币。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曾在西藏地区铸造过三种银币，数量当然很少，内地可能没有流通过。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五年间，上海商人王永盛、朱裕泰等人曾铸造过一两重的货币，称作“银饼”。既然私铸都是被允许的，那么纯度固定、使用便利的外国银币自然也被允许流通，并且极受欢迎。

清政府对铜钱的铸造，采取的是国家垄断政策，但对本位银钱，却始终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之所以允许私铸银币，甚至同意外国货币的流通，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铜的管制能够防止铜被用于制造武器，而银不能用于制造武器。

清末，政府曾在吉林、武昌、长沙等地制作银币。其中，吉林的银币较少流通；武昌的银币共六百四十八万枚，但很快又回收了，原因未明，或许是出现了伪品。

当时流通最多的银币是墨西哥银圆。这种银圆上有鹰的图案，因此又称“鹰洋”。“洋”指洋银，即西洋银币。这种洋银因支付茶叶而流入中国，并直接在社会上流通。

国内现银充足时，百姓生活相对容易一些，反之则会感到压力。

大量出口茶叶，而没有畅销的进口商品，导致了国内银钱过剩。然而不久，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广受欢迎的进口商品。

这就是鸦片。

这种印度制造的进口商品，彻底扭转了中英两国的贸易状况。英国试图利用鸦片，扭转常年入超的不平衡局面。

这一企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英国向清朝出口鸦片的收入远远超过从清朝进口茶叶的支出，于是和过去截然相反，清政府出口茶叶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抵销进口鸦片所支付的货款，因而必须用现银来填补空缺。因此，白银大量外流。

由出超的极端转向入超的极端——这种不寻常的戏剧性转变，给百姓的生活蒙上了阴影。

关于白银外流的问题稍后再谈。下面说说鸦片的问题。



带有中国商人戳记的墨西哥银圆



西班牙银圆

---

[1] 又称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的年代，1603年创立，1867年将政权归还朝廷，是日本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的时代。

[2] 即茶歇，指工作期间片刻的休闲，喝茶吃点心。

[3] 印度的一个邦，位于印度东北部。

[4] 即现如今的斯里兰卡。

罂粟之妖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1]意思是：前代很少听说鸦片，最近才有人在处方中使用。可见起初中国并没有鸦片。

"Opium"一词源于阿拉伯语。由此推测，吸食鸦片的习惯很有可能源于中东一带。

鸦片一旦沾上，就很难戒掉。

J.科克托[2]说："罂粟很有耐性，人吸过一次鸦片后肯定会吸第二次，鸦片懂得等待。"他又说："一旦尝过鸦片的滋味，离开了鸦片，是很难活下去的。"

过去，不少中国人相信这样一个传说：印度人种植罂粟时，将一对相爱的年轻男女绑在一起，待两人的性冲动达到顶峰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以汩汩流出的鲜血灌溉罂粟。

大概因为相爱的恋人难分难舍，而这又与染上鸦片就难以戒除相似，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传说。

罂粟花在中国的诗词中也被称为"相思草"。

王尚辰有一首关于鸦片的长诗，名叫《相思曲》：

炎荒瘴毒金蚕蛊，
皂鸦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
抟[3]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
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

氤氲[4]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

朝暮无已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一生甘为相思死。

王尚辰作此诗谴责鸦片对人的毒害，但诗中也有赞美鸦片的词句。

若到黑甜之乡，唤彼为引睡之媒。倘逢红粉楼中，藉尔作采花之使。

在这首诗中，“彼”和“尔”都是指鸦片。睡觉时，鸦片可用于催眠；行房时，鸦片可充当媚药。诗中的“采花”是行房的雅言。

目前尚不清楚鸦片最初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本草纲目》中说鸦片“前代罕闻”，可见前代并不是完全没有。

根据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关税表，两斤鸦片约值两根银条，其规定税率为每十斤纳银二钱。可见，鸦片的正式进口是得到批准的。当然，其性质是药材，而且数量极少。

鸦片源于罂粟植物蒴果。早在西汉时期，鸦片就已经传入中国。少量的罂粟可以助眠、止泻，还可以当镇静剂。当时，鸦片只是用来入药，而且用量不多，并不会使人成瘾。

鸦片在中国不再只是治病的药材，而是成为一种嗜好品并得到普及，是进入清代以后。据说，吸食鸦片的习惯或许源自台湾一带。台湾疟疾盛行。这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风土病。鸦片在镇痛方面有着奇特的功效，因而被广泛地运用。不难想象，有些人在把鸦片当作药物服用的过程中逐渐成瘾。

吸食鸦片的恶习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是有种种原因的。

鸦片商人利用百姓的无知，非但隐瞒鸦片的危害，反而将鸦片宣传成长寿药—— 这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便是现在，依然有人相信鸦片可以延年益寿。从表面看来，似乎有一些征兆显示鸦片对身体有益。譬如有人指出，鸦片上瘾者不会得感冒。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不得感冒，只是感官麻痹，觉察不出感冒的症状罢了。长期吸食鸦片的人一旦戒掉鸦片，就会出现打喷嚏、咳嗽等类似感冒的症状。这是因为鼻腔等处的黏膜恢复了知觉。

还有一种说法——吸食鸦片能延长房事时间。其实这也不过是因为感觉钝化，人始终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而已。“鸦片孕育半梦。”科克托的话一语中的。

另外，由于政治腐败、人口增长等因素，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吸食鸦片能让他们暂时忘掉现世的痛苦。这也是鸦片盛行的一大原因。

英国也曾出现类似的情况。当时，曼彻斯特的工人工资低，买不起酒，就以鸦片代替酒，借以忘掉不幸。可见，当时鸦片是非常便宜的。

鸦片瞅准了衰世，才得以在中国泛滥。当时的社会“恹恹无生气”，才让鸦片有机可乘。若是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譬如康乾盛世，鸦片定然是打不进来的。日本能逃过“鸦片的入侵”，是因为当英国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并向外推销时，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末期。

为了逃避痛苦，东方人吸食鸦片，西方人饮酒—— 曼彻斯特的工人买不起酒，不得已才用鸦片代替。酒可以使人快活、热闹，而鸦片使人平静、迟钝、冥想。“酒使人疯狂，而鸦片使人节制。”这句话也是科克托说的。

鸦片吸食者及烟具组图



吸食鸦片的人



鸦片烟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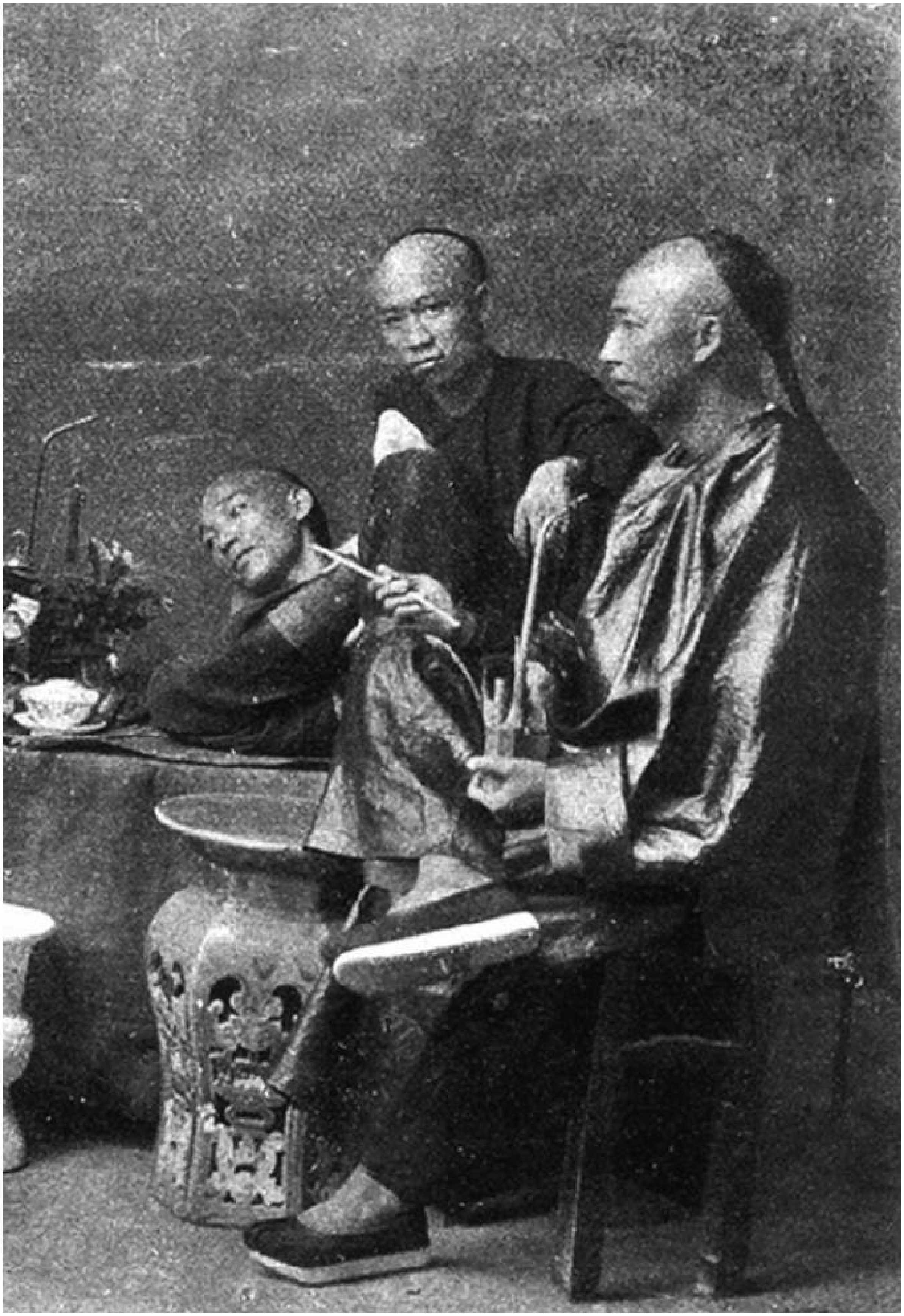


鸦片烟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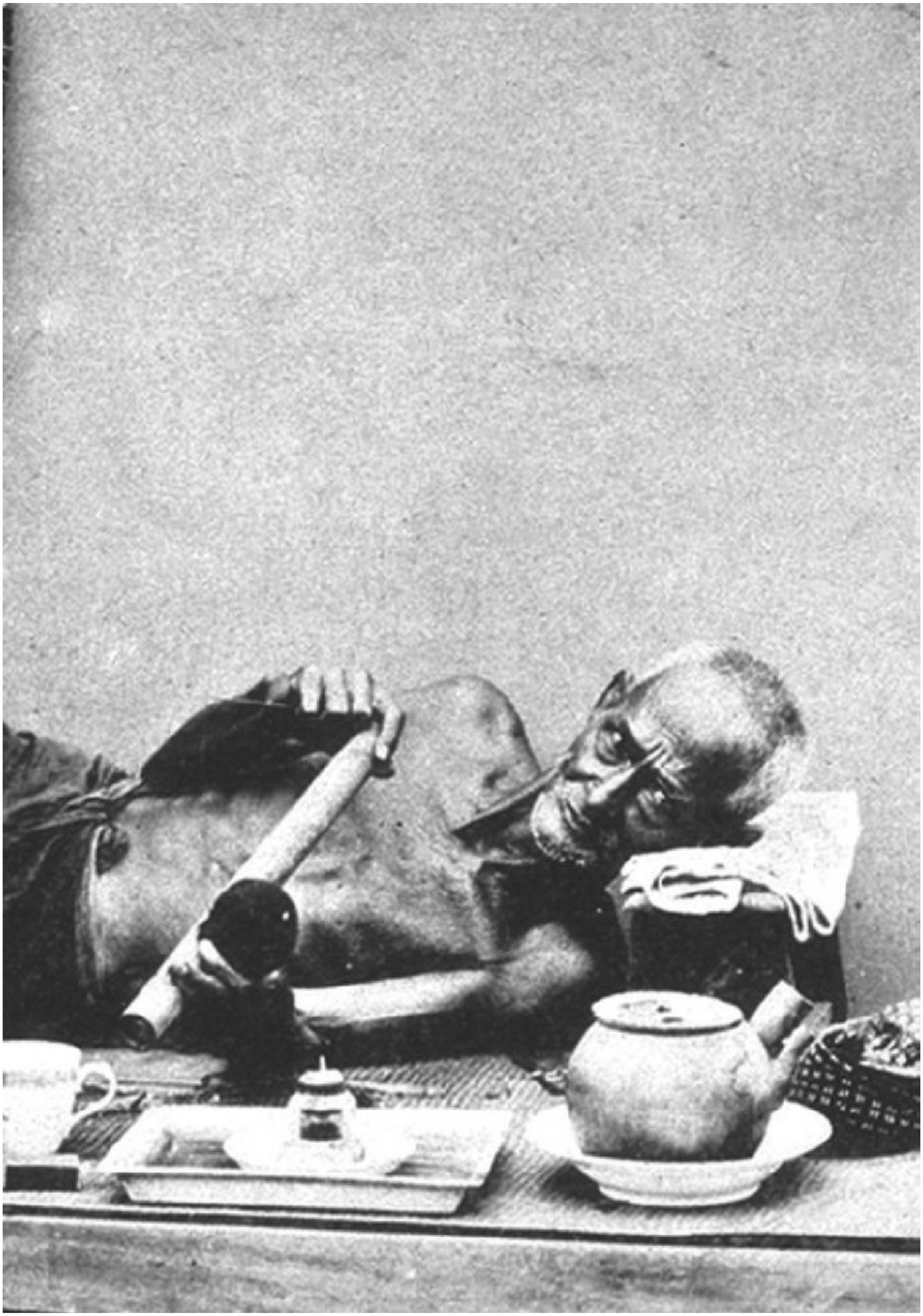


鸦片烟具









[1]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三卷。

[2] 法国诗人、剧作家、画家。

[3] 此句有不同版本，也作：搏就相思一块土。

[4] 也作絪缊。

漏银

清政府早就颁布过禁止鸦片的法令。

凡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再次颁布禁令。东印度公司已经获得了孟加拉鸦片的专卖权。打算将鸦片作为出口清朝的主要商品。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间，前半段每年仅进口鸦片两三百箱，后半段虽有所增加，但也没有超过一千箱。进入十九世纪后，即嘉庆年间，鸦片的进口量猛增。事实上，嘉庆元年（1796年）就已经出现了鸦片进口量激增的趋势。因此，清政府从关税表上删掉了“鸦片”项，禁止鸦片进口。

在此之前，清政府对进口的每箱鸦片征收的税银是三两。一箱鸦片净重为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磅，约合六十千克。

嘉庆四年（1799年），清政府禁止种植罂粟。主张禁止鸦片的人认为：“外夷以污浊之泥土，易我中国之货物与金钱，属实可恨；且恐内地臣民吸食渐众，致令废时辍业，倾家荡产……”

然而讽刺的是，鸦片的进口量却有增无减，当然，是通过走私进口的。显然，这与当政者玩忽职守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政者对于百姓的“废时辍业”无动于衷，甚至害怕百姓变聪明，因而常常采用“愚民政策”。只要不影响租税的缴纳，适当地吸点鸦片，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反倒能帮当政者免去不少麻烦。当然，若愚民政策施行过度，会使百姓丧失缴纳租税的能力，进而引发社会动荡。这对当政者而言是不利的。但只要尚未发展到这种地步，当政者对鸦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日本，只有长子可以继承遗产。而在中国，只要是儿子都可以分得遗产。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土地越来越分散，农民越来越贫

困。日本依靠长子继承制维系了“家”这一社会基础和核心。而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人口成倍增长，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后果。当意识到这一问题时，绝大多数百姓已经沦为赤贫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濒临生活的极限，无力养活自己和家人。农民被逼到这种地步，自然也无力缴纳租税，于是只好逃亡，沦为流民。为了躲避追查，保护自己，流民成群结伙，成为所谓的“流寇”。

中国的农民无疑是很能忍耐的，但忍耐终是有限度的。当几千万人达到这个限度时，社会就会崩溃。中国历代王朝大多是这样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譬如前代的明朝，早在清兵入关之前，就已经衰弱不堪了。

鸦片问题之所以被提上日程，且越来越受到重视，显然是因为清政府意识到了它是社会动荡的根源所在。

百姓已经无力承担租税了——不只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就连不沾鸦片的普通农民也是。

事实上，租税并没有提高。租税的多少自然也是用银的重量单位“两”来表示的。但寻常百姓使用的一般是铜钱，不是银两。因此，缴纳租税时，人们需要先将铜钱换成银两。

乾隆以前，一两银约合七百文铜钱，后来逐渐升到八百文、九百文。这是由供需平衡的经济法则引起的—— 东西少了，价格自然会升高。鸦片的进口导致白银外流；白银不足，银价就会上涨。据载，道光十年（1830年），一两白银可以换一千二百文铜钱，约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则可以换到两千文。

租税没有变，还是一两银子，但就铜钱的价值而言，却相当于从原来的八百文涨到了一千二百文乃至两千文。

当时的统治阶级之所以将鸦片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不是体恤老百姓，而是察觉到危机，害怕百姓因走投无路而造反。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通常，鸦片被装在一种垒球大小的球体中。球的外壳是用一种类似于硬橡胶的物质做成的。这种胶状物是用劣质的鸦片汁熬成的。四

十个这样的鸦片球装成一箱，每箱净重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磅。木箱是用杧果[1]木做成的。

根据品质的不同，鸦片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其中最上乘的鸦片是孟加拉产的，称作“公班土”。称之为“土”，是因为鸦片的颜色和质感很像泥土。“公班”是英文“company”的译音，是“公司”的意思。在此专指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东印度公司专卖鸦片。次于“公班土”的是在孟买装运的马尔瓦产的鸦片，称作“白皮土”。最次的鸦片是在马德拉斯[2]装运的“红皮土”。

此外，土耳其产的鸦片叫“金花土”，伊朗产的鸦片叫“新山”。贩卖这两种鸦片的主要是美国商人。

至于鸦片的进口数量，因为是走私的，清政府没有准确的数据。马士[3]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有记载，现摘录以下年份的鸦片进口量[4]。

年　份	数　量（箱）	价　格（西班牙银圆）
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	三千六百九十八	四百零八万四千
道光元年（1821 年）	四千七百七十	八百四十万零八百
道光五年（1825 年）	九千零六十六	七百九十二万七千五百
道光九年（1829 年）	一万四千三百八十八	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九千
道光十三年（1833 年）	两万一千六百五十九	一千四百二十二万两千三百
道光十八年（1838 年）	两万八千三百零七	一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八百

不过，根据迈克尔·格林伯格的《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港，1800-42》（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42）中的记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鸦片的进口量就已经超过三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的进口量则超过了四万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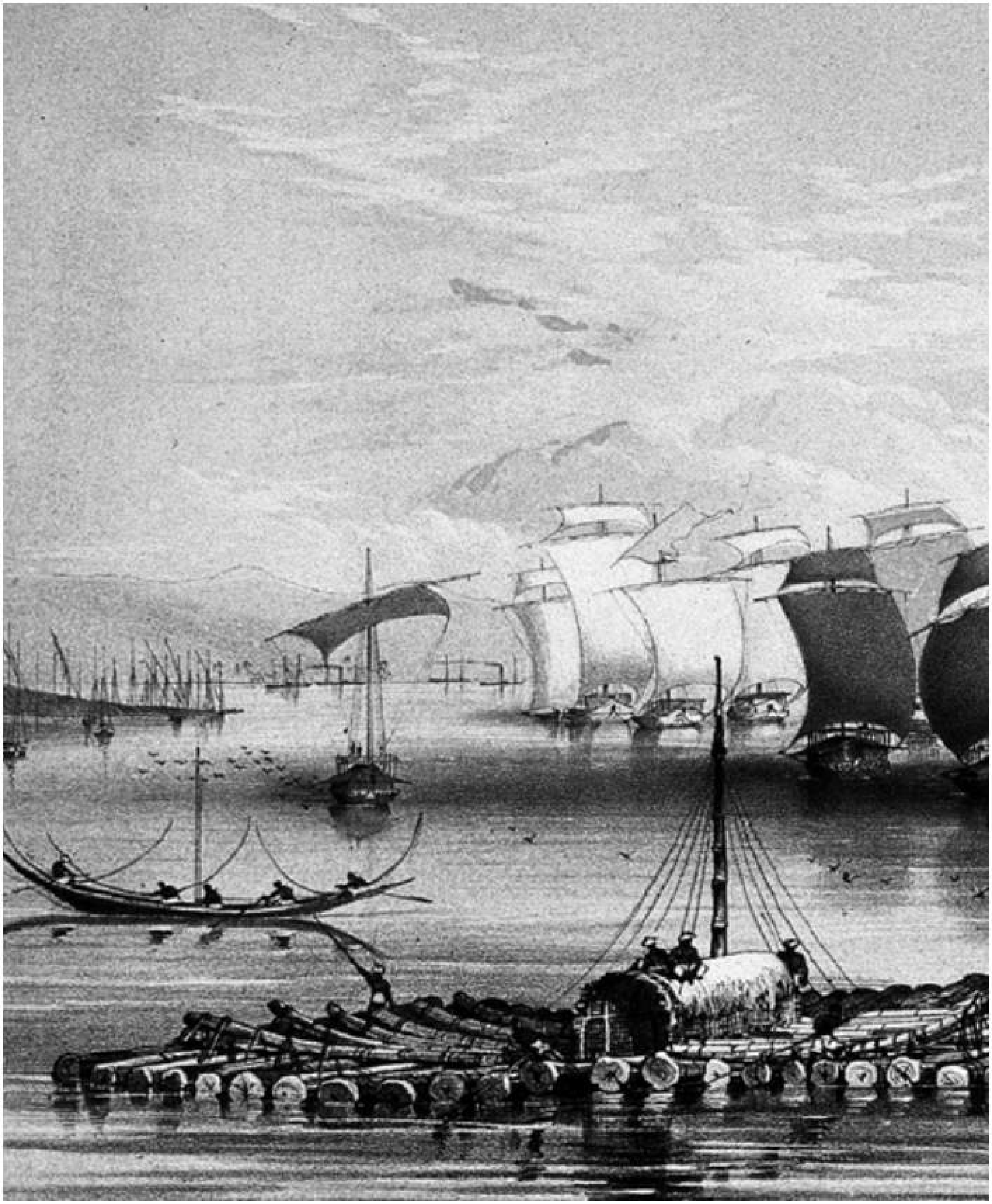
马士的统计数据主要是以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为依据，因此可能不包括产自土耳其和伊朗的鸦片。此外，印度产的鸦片中，数量可观的马尔瓦产的鸦片是先送到葡萄牙领属的达曼-第乌，再由葡萄牙船只运往中国；马士可能也没有统计这部分鸦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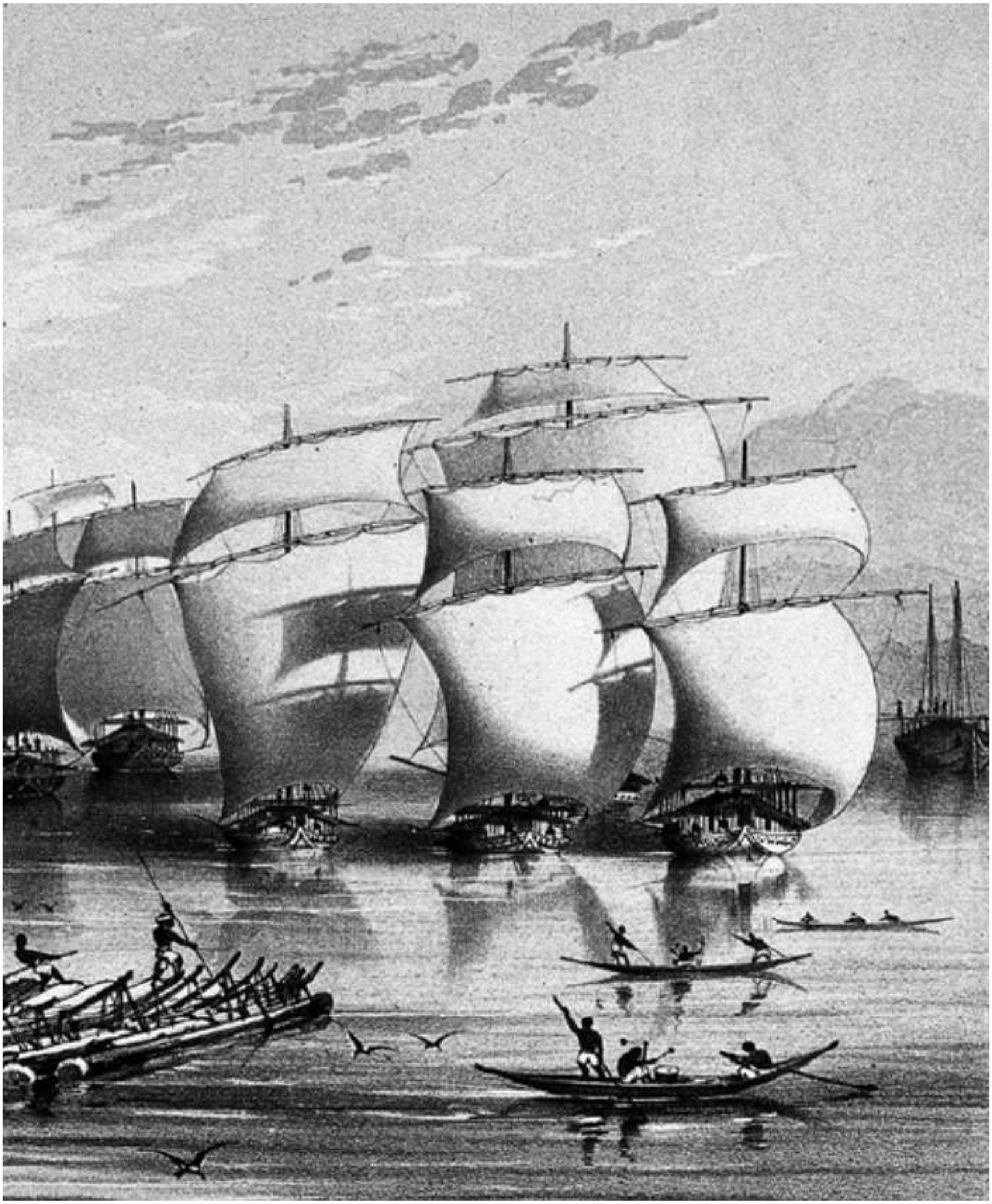
清代的银一两等于十钱。而一个西班牙银圆的重量是七钱三分五厘，即约合白银零点七两。根据马士的统计，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口鸦片的总额约两千万西班牙银圆，折合成白银约为一千四百万到

一千五百万两。若进口的鸦片真超过四万箱，所需的白银可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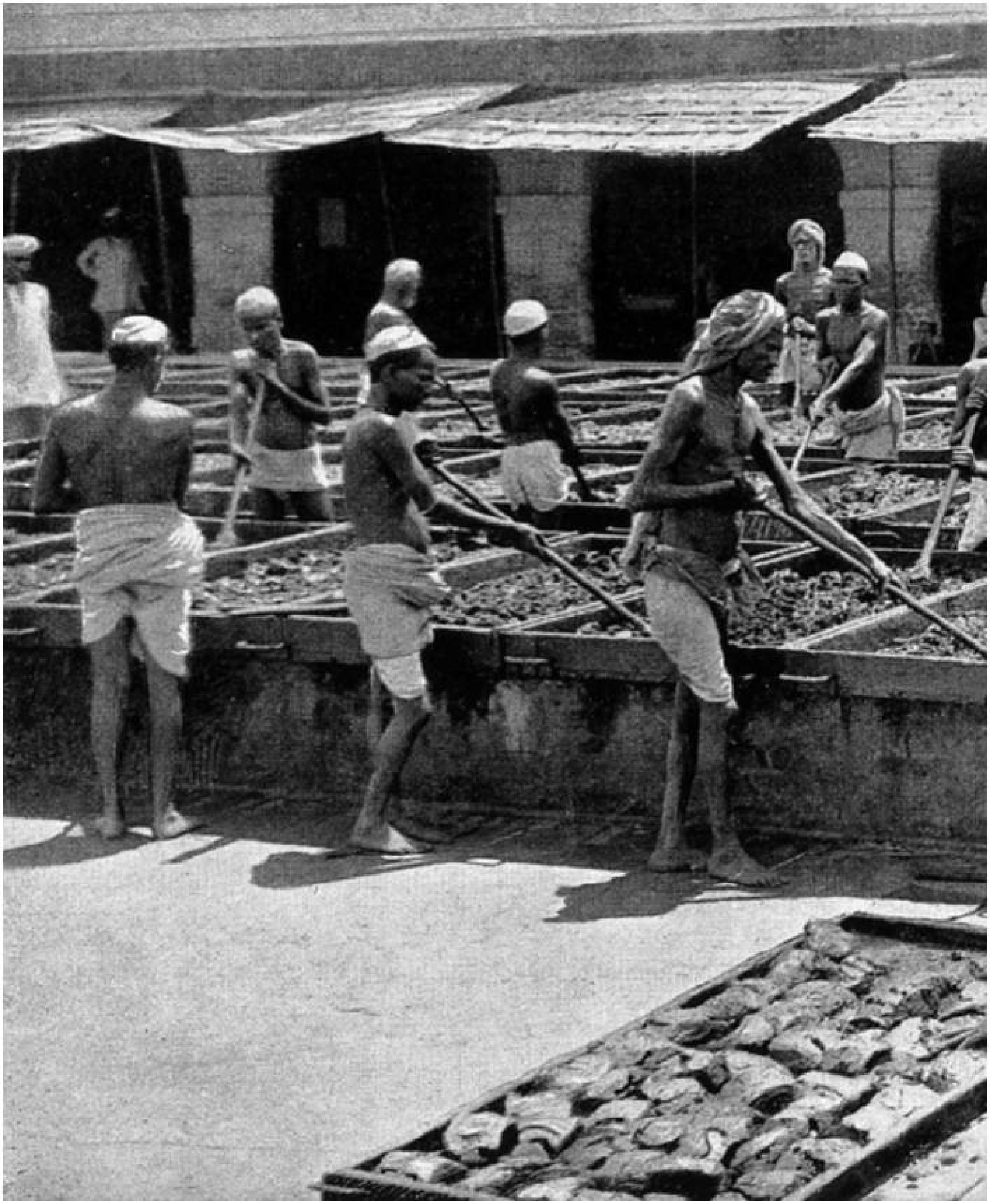
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约为白银四千万两。出口最多的商品是茶叶，年出口额约为两千万西班牙银圆。进口的商品有棉花以及其他杂品，其中棉花货值约一千万西班牙银圆。因此，正式的贸易收支是理想的。但是，如果将购买鸦片的两千万西班牙银圆算上，收支状况就会出现大逆转，从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

白银外流带来银价上涨，实际上等于大幅增加了百姓要缴的税。这无疑将百姓逼入困顿的境地。





恒河上的鸦片船



[1] 杧果，也作芒果。



印度工人在加尔各答的庭院里混合鸦片

---

[1] 杧果，也作芒果。

[2] 即今天的金奈，南印度东岸的一座城市。
[3] 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1874-1908年曾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服务。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4] 数据引用自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八章鸦片问题，第233-234页附表。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

夷馆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开放长崎港与荷兰及中国进行通商。在日本从事贸易的外国人只能居住在出岛[1]，不得随意外出。因此，荷兰人把出岛称为“远东的监狱”。

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素来把以农为本、自给自足视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与外通商就意味着否定这种自给自足。明朝也把“海禁”（即闭关自守）作为一项国策。中国过去从未主动向外国提出过通商的要求；当对方提出通商的请求时，中国方面通常回应：“蛮夷远道而来，实在是可怜，那就准许通商吧！”政府的公文上一般写“应加体恤”，即把同意通商当作对对方的恩赐。

清朝只开放广州口岸。这与日本只开放长崎港类似，但不像日本那样只限于中国与荷兰，而是允许各国利用港口。不过，与沙俄的贸易多通过陆路，地点是贝加尔湖南畔的恰克图。清政府认为，贸易若能在对方的国境内进行，就没必要在本国进行。

对于闭关自守的逻辑，清朝和日本大同小异，连外国人居住地都很相似。政府将广州城西约两百米的西关一带，设为外国人的居所，称为“夷馆”。

和长崎一样，广州也对“夷人”施加了种种限制：

一、夷人居住在夷馆，不可随意外出；但准许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天到附近的花地海幢寺散步、运动，每次不得超过十人。

二、禁止夷人携番妇（外国妇女）前来广州。

三、夷人不得坐轿。

四、禁止夷人雇用中国人。

五、禁止夷人在广州过冬。

当时属于帆船时代。欧洲的船大都借着五六月的西南风来到广州，又趁着十月前后的西北风返航。禁止外国人在广州过冬，意味着外国人做完生意后不得耽搁，得立即回去。

实际上，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严格地遵守。比如，如果严格遵守不得雇用苦力装卸货物的规定，恐怕生意就没法做了。当时的夷馆里已经有中国女佣了，女佣被称为“阿妈”（现在中国香港有些地方仍沿用该称呼）。在夷馆里做杂役的男性被称为“沙文”。这是英文“servant”的译音。

禁止外国人在广州过冬的规定也没有得到遵守。官员收了贿赂，对于一般的事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起“远东的监狱”里的荷兰人，在广州的外国人待遇要好得多（旁边就是澳门。葡萄牙人已经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可以到澳门放松一下。虽然不能带家眷进广州，但可以将家眷安置在澳门。而在长崎的荷兰人如果想要放松一下，只能去爪哇岛的巴达维亚[2]。

道光十年（1830年）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的人口调查记录现在还保存着。

白人 男 一千二百零一名

女 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仆 男 三百五十名

女 七百七十九名

一般说来，外国人居留地不会出现女多男少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上述数字，是因为外国男人大多在广州工作。

在夷馆里的外国商人被称作“夷商”。按规定，只有某些获得特许的商人才能和夷商做交易。那就是“行商”。行商人数不多，是得到户部批准的。广州行商组成同业公会一样的组织，称作“公行”。

夷馆所在的地方叫“十三行街”，十三座西式建筑排列有序，自西向东依次为丹麦馆的黄旗行、西班牙的大吕宋行、法国的高公行等。这在中国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景象。不过，后来在各行设事务所的商人，其国籍未必与所标示的国家一致。例如，鸦片战争以前，黄旗行中进驻了三家美国商行，荷兰的行馆则被瑞典商行租用。英国的保和行自然是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这些夷馆被外国人自己称为“代理商行”（Factory）。

夷馆正对大马路，两侧有门，一般以弧形的长廊相连。后有庭院，庭院临河。一楼有办公室、仓库、售货处、买办室，以及用人的休息室等；二楼是食堂和会客室；三楼大部分是卧房。

坚固的铁质金库位于一楼，由中国的买办负责管理。这种金库被中国人称为“钱库”，但事实上，里面装的主要是白银，称“银库”也许更合适。买办对进出钱库的金额进行登记，如果事后发现数额不足或掺假，就必须赔偿。按照交易的数额，买办可从每千圆中收取两角的手续费。虽然一万圆才得两圆，但每天的金额有数十万圆，因此买办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

按规定，夷馆里所需的日用品和食品，也由买办采购。

鸦片战争期间，十三行街上最大的洋行[3]是怡和洋行（即渣甸洋行）。其实力仅次于同属英国的宝顺洋行（即颠地洋行）。

尽管各国商人都聚集在这条街上，但无论怎么看，这里都是英国商人的天下。

十三行街上的夷馆几乎都从事鸦片贸易。只有美国的欧立福特洋行是个例外，被外国商人称为“圣地”，意思是大善人的商行。这样的

商行可谓凤毛麟角。当时鸦片买卖之盛行可见一斑。

对于夷馆中的外国商人而言，最头痛的莫过于交易对象受限制。他们只能和获得了特许的大约十家行商进行交易。而行商成立了同业公会组织—— 公行，结成了统一战线，可以随意压低棉花的进口价格，或提高茶叶的出口价格。外国商人对此感到很棘手。能够自由地与任何人做生意，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

[1] 江户时代幕府执行锁国政策时所建的人工岛。

[2] 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3] 旧指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行，后多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商行。

公行

鸦片战争时，获得清政府特许并加入公行的行商只有十家，垄断了清政府的对外贸易，自然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行商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但行商也有苦恼—— 贿赂和捐款。

公行由户部直接监管，户部在广州设海关。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地方大员在广州设公署衙门。此外还有八旗驻军和绿营。官员动不动就向腰包鼓鼓的公行成员索要财物。朝廷遇上红白事，要求公行成员献款；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则强制摊款；军队出征，也要筹措军饷。除了这些不定时的费用，行商每年还要向朝廷献款。巨额的款项紧紧勒住了行商的脖子。

因强制索取和捐献，行商受到了重重剥削。而令其不满的远不止这些。

行商虽然可以交易茶叶或棉花，但不允许参与走私鸦片。当时，鸦片已成为对华贸易的最大宗商品。因此，行商在名义上拥有垄断贸易的特权，实际上却没能真正垄断贸易。

这些特许商人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公开经营鸦片。行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参与非法的鸦片贸易，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却有可能失去正规贸易的特许权。后者自然也大有油水可捞。总之，行商想兼得鱼与熊掌，如意算盘打得真是响！

鸦片合法化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如果鸦片成为获准交易的商品，自然就和棉花、毛织品一样，鸦片的进口将由公行成员垄断，由此将带来巨额利润！光是想想，就足以令行商陶醉。

公行的代表称为总商。道光十三年（1833年）到鸦片战争期间，总商由怡和行的行主伍绍荣[1]担任。自嘉庆十四年（1809年）至取消公行为止，英国历任驻华商务总监督，都要和伍家打交道。在外国的资

料上，怡和行的行主都叫“Howqua”，即“浩官”。“官”是敬称，就像郑成功的父亲是郑家的大公子，被称郑一官。曾经的怡和行的行主伍秉鉴的乳名叫“亚浩”，人称“浩官”。外国人仿效了这一称呼。

中国人没有袭用父名的传统，甚至不能与父母名使用相同的字。外国人或许是图方便，将浩官的儿子称为“Howqua Junior”，即小浩官，在形式上袭用了父名。伍绍荣，本名伍崇曜，别名伍元薇，字良辅，号紫垣。伍氏家族几代浩官，伍秉鉴和伍崇曜是最有名气的。

伍绍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曾出资刊刻《粤雅堂丛书》。

他很早就意识到公行的危机，深知行商表面风光，实际上十分拮据。当时的十家行商中，只有怡和行和另外两三家营业较正常，有几家甚至已经濒临破产。

作为垄断贸易商，却经营惨淡，甚至出现赤字，这不得不说是件怪事。究其原因，除了行商为撑门面，不得不拿出巨款用以贿赂和献款，还有其他的陷阱等着行商掉进去。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封闭闽、浙、江三海关，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并且只能与广州行商交易。这就是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体制。1686年，广东招募了十三家有实力的行商，称为“十三行”。行商负责对外商到港船货查验、登记，向海关申报，并向清政府担保外商合法经营。

当时全世界利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广州。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由于走私鸦片这一特殊买卖的存在。工业革命以后，金融遍及全球，金钱当然往利率高的地方流动。

国内外的金融业者纷纷涌向广州，外国的主要是印度的巴拉斯人。孟买是印度第一大港口，孟买大区是印度人口第二密集的地区。现在，孟买的巴拉斯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依然控制着印度的经济。他们离开了祖先的土地，在印度以经商为生。

巴拉斯人来到广州。他们缠着白色头巾，因而被中国人称为“白头夷”。

在贸易繁荣的地方，对贷款需求也多。但是如果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那肯定是不行的。巴拉斯人初来乍到，很难了解每个借款人的信用情况。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法—— 找信誉好的店铺或人物当中间人，给他们支付一定的佣金，让他们替借款人作担保。如果借款人无法偿还债务，就要中间人来负责还钱。巴拉斯人认为，在广州拥有贸易垄断权的行商，是绝对稳妥可靠的。

就这样，外国资本通过行商之手流入清朝。作为中间人，行商一手接过资金，一手递给别人，从中捞取佣金。这激起了他们的欲望：只要有担保，白头夷就会无限制地放贷；流动资金越多，佣金自然也越多。

这其实是个深坑。巴拉斯人找行商做中间人，是为了防止错估借款人的信用，或草率地把钱借给不合适的人，导致无法收回借款的情况。现在，中间人收取佣金作为报酬，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就必须连本带利地偿还借款。

从行商的角度来说，其不得不这么做。面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行商不肯替借款人还债，就会被债权人提起诉讼，就会被吊销特许权，从而失去贸易垄断权。因此，行商就算再不愿意，也得替借款人还债。巴拉斯人实际上就是瞅准了行商这一软肋。

但是如果老为欠债不还的人作担保，即使行商的资金再充裕，也会逐渐衰落。而且为了填补亏空，反而更容易重蹈覆辙。

作为公行的总商，伍绍荣知道已有不少行商陷入这种困境。他觉得应该救这些行商，却无计可施—— 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回局面。那就是让鸦片合法化，由行商垄断鸦片贸易。



1830年的广州港

---

[1] 即伍崇曜，绍荣是他的商名。

走私贩运

不合法的商品鸦片，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走私贩运的呢?

在十三行街上设立办事处的夷商，除“圣地”欧立福特洋行这样的少数特例外，普遍都兼营鸦片，有的甚至专做鸦片贸易。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将鸦片存放在十三行街这个地方。外国人能在此做生意，是天朝的特别恩典。当时的夷馆并没有治外法权。一旦鸦片被发现，不仅正规贸易会被禁止，就连夷人也会被驱逐。他们曾把鸦片存放在澳门，但这也不稳妥，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 建造海上仓库。

Store-ship，中国称为“趸船”，不是用来航海的。其船身很高，是专门用于存放鸦片的仓库。

夷商们把这种可以称为“鸦片母船”的怪船停在珠江口伶仃岛的洋面上，正好在香港和虎门的中间位置。

虽然货物存放在海上，但实际洽谈是在十三行街进行的。谈好后，夷商在标有鸦片级别和数量的领货单上签字，一手收钱，一手将单子交给走私鸦片的中国人。这种领货单被称为“券”。在券上签字叫“立券”。和实物一样，券也可以在市场上直接进行买卖。正规贸易在每年十月左右就结束了，鸦片贸易却是常年都有。夷馆的这种立券业务，使得禁止夷人在广州过冬的规定名存实亡。

走私鸦片者拿到券后，乘船去伶仃洋上的趸船上换鸦片，装载鸦片后返回。为了躲避巡逻船，必须使用快船，就是速度很快的“快蟹船”。船上悬挂着风帆，左右各五十支桨，船员一百名。据说这种船可承载数百石，且“来去如飞”。根据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于道光十一

年（1831年）呈递的奏折，当时有两百艘这样的快船，而水师的船根本追不上，加上“各关有重贿”，因此被抓住的很少。

广州水师中有一个叫韩肇庆的军官，负责海上警备，因为禁烟有功而被晋升为广州水师总兵。我们来看看他的“功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鸦片从趸船上运往岸边时，为了不被官府截获，夷商和走私者会上缴百分之二的鸦片作为贿赂。也就是说，一万箱鸦片中抽出两百。这个韩肇庆把一半揣进自己的腰包，另一半作为“缴获品”上交给朝廷。

鸦片是违禁品，成本自然高于一般的商品。由于运送困难，卸货地越远，价格就越高。一箱“公班土”，若在伶仃洋的趸船上交货，价格是八百西班牙银圆；稍稍北上一些，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南澳便要一千西班牙银圆；再往北，价格更高。因此，鸦片商经常北上。

但是从珠江到南澳的途中，在大亚湾、红海湾、甲子港等地有不少海盗巢穴，存在被打劫的风险。外国鸦片商人已经和各地的官兵私下约定，每箱鸦片支付十圆的“默许费”。因此，他们不担心会被官府抓捕与没收货物，但害怕遭到海盗袭击。

鸦片船进入南澳后，若遇上官船，只需漫不经心地解释几句：“我们从新加坡去广州，中途被风浪冲到了这里。”清朝水师的军官随即登上外国船，在甲板上装模作样地高声宣读禁令：“天朝只允许在广州通商，不得在此地进行。”“是，是！”外国船长这么答应两声。

随后军官就被招呼进船舱进行商谈。这在英国的文献中称为“私人会面”，实际上就是商定和收取默许费。之后，鸦片船就受到清朝水师的保护了。因此，在广州之外的地方，有着更有利的交易机会。

夷商总是设法打破只限在广州通商，且只允许与公行进行正式贸易的限制。夷商希望废除公行，自由贸易，并且在广州以外的各地通商（即门户开放）。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方面称是为了使清政府同意上述两项要求不得已而为之，企图将战争正义化。就结果而言，通过鸦片战

争，英国的这两项要求得到了满足。不过，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这场战争是英国为了强制进行鸦片贸易而发起的，是非正义战争。

英国更换代表

长久以来，东印度公司都掌握着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该特许证每二十年更新一次，1834年又到了更新的时候，但英国议会在1832年就决定不再将对华贸易特许权交给东印度公司。

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自此退出了舞台，原因是多方面的。

工业革命后，英国进入工业化时代，普通市民也拥有了选举权，而在此之前，只有那些缴税达到十英镑以上的人才能够享有世袭的选举权。这一改变意味着贵族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商市民的时代，自由、进取和工厂取代了世袭、保守和领地。在对外贸易方面，新兴的工商市民主张自由竞争，认为垄断不合理。

此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效率极低。这是其被取消特许证的主要原因。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重达一千二三百吨，但航行一趟，在广州获得的纯收益平均不过三四万圆。美国商人用的一般都是重三百五十吨的小型商船，但平均每艘船的纯收益却能达到四万到六万圆。这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已然官僚化，视特许证为铁饭碗，思维僵化，不懂应变，而美国商人则怎样有利可图就怎样做。例如，美国商人把本国的农产品运往欧洲换成西班牙银圆，从印度把鸦片运到澳门，在广州收购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带回美国。

这并不是说美国商人就比英国商人聪明。问题出在贸易机制上。既然垄断不利于提高收益，那就取消特许证，让商人自由竞争。基于此，英国议会通过了1832年的决议。

尽管对华贸易过去被东印度公司垄断，但“个体贸易商”早已通过承包的方式，活跃在对华贸易中。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就是其中的代

表。

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的代表被称为“大班”。公司退出对华贸易的舞台，公司代表自然就不存在了。不过，这并不表示贸易不再需要指导和监督，反而更需要加强。因为东印度公司是与大资本紧密联系的组织，而取代它的个体贸易商无论是资本还是组织，都比较薄弱。因此，英国政府决定重新设立驻华商务总监督一职。英国政府派遣代表前往广州，取代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这并不是简单的人事变动。大班只是公司派出的职员，而商务总监督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尽管职位并不高，但国王陛下的官员自然应该受到礼遇。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是威廉·约翰·律劳卑，时年四十七岁，曾任海军上校，拥有贵族头衔。

不过对清政府来说，代表的是东印度公司还是大英帝国，根本不重要。通商本就是对夷人的怜恤，这是清政府一贯的看法——蛮夷之国请求进贡，这种对天朝的仰慕是很好的；天朝体恤远方来客，这才同意通商，还赏赐给他们很多东西。这种观念与正常的外交理念背道而驰。而只有对等的国家之间才能进行正常的外交。但是这种唯我独尊的观念认为，外国都是蛮夷之国，是朝贡国或者天朝的附属国。因此，英国政府和清政府之间，不可能实现对等的外交。

英国政府当然希望能和清政府对等交涉，缔结通商条款。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勋爵前往北京。他访华的目的是实现自由贸易、增加通商口岸，但清政府没有做到对等交涉，甚至要求阿美士德向嘉庆皇帝三跪九叩。阿美士德代表的是英国国王，自然没有同意，因此遭到了驱逐。后来他成了印度总督，接替因财政问题而辞职的黑斯廷斯侯爵，直至光荣隐退。律劳卑被任命为驻华商务总监督的时候，他还在世。

律劳卑认为，阿美士德与清政府交涉失败了，但仍能青云直上；如果自己能说服清政府同意平等交涉，必将名垂千古。意识到这一

点，他振奋无比。

1834年1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前往清朝的律劳卑做了如下指示：

一、到达广州后，第一时间书面通知两广总督。

二、尽可能将通商范围扩大到广州之外的地区。

三、设法与朝廷直接交涉。

四、除特殊情况外，暂不与中方产生新的关系。如果有需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候指令。

五、若无特殊需要，不得将军舰开进虎门以北（虎门水道以北被清政府划为内河）。

律劳卑的失败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抵达澳门。数日后，他乘坐“安德洛玛克”号军舰到达穿鼻。穿鼻位于虎门水道的入口处，律劳卑在这里换乘小艇奔赴广州。他谨遵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指示，没有让军舰开进虎门。

到达十三行街后，律劳卑按照巴麦尊的指示，把告知到任的函件交给书记官阿斯特尔，命他转交给两广总督。然而，任凭阿斯特尔跑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帮忙转交函件。清朝方面认为，夷人给总督写信，实属无礼！

以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与清朝当局交涉时，程序一般是：先向公行提交“禀”，即恳求书，作为书面请求，再由公行转交给海关监督。

“商务总监督和大班不一样。”阿斯特尔反复解释，但清朝方面根本听不进去。

公行总商伍绍荣夹在中间，处境可以说相当尴尬。

按照规定，和夷人相关的事宜，都由公行负责。夷人简直胆大包天，竟然要求直接与总督对等通信，公行对这件事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夷人要想进入广州，必须事先提出申请，但律劳卑跳过这道程序直接跑进来了。在英国看来，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的官员，不需要卑躬屈膝地请求入境，但在清朝看来，这是堂而皇之的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公行没办法，为了对整件事负责，不得不宣布停止与这些“不逞之徒”的贸易。

律劳卑没有妥协。

于是，两广总督亮出了撒手锏—— 封舱。他一声令下，不但停止了一切对英贸易，而且要求夷馆内的通事[1]、买办、伙夫、仆役等所

有中国人离开夷馆，同时发出告示，称凡是向英国商馆提供食物者，一律处以死刑。随后，清军包围了英国商馆。

律劳卑派出密使，命令停泊在外洋的“安德洛玛克”号和“伊姆杰”号军舰开往广州。这违背了巴麦尊的指示——军舰不得进入虎门以北，但在律劳卑看来，这是“特殊需要”。

两艘英国军舰沿珠江逆流而上，向广州开进。在与虎门炮台的交火中，“安德洛玛克”号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两次搁浅，最终开到了黄埔。

而此时，被围困在夷馆中的英国人已然疲惫不堪，律劳卑发起了高烧。军医柯涅奇诊断他是患了疟疾。

律劳卑试图用炮舰恫吓清政府。但是由于清政府不接受任何函件，他只好给广州的英国商会会长波伊特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谨代表英国国王，抗议总督和巡抚的非正义行为……抗议他们滥用权力。阁下务必告诉他们（公行）：英国国王功绩卓著，统治着比清朝更辽阔、更具影响力的土地；英国军队勇敢无畏、所向无敌，拥有清朝人闻所未闻的大船，不仅能在海上平稳行驶，还配有一百二十门大炮……如果十五日（星期一）之前未能得到关于此事的答复，我将散发这封信的抄件，相信总有一份能送到北京的皇帝手里……

为了对付闯进来的两艘军舰，清朝方面由提督麾下调大师船两艘，由广州将军麾下调大小师船六艘及内河巡船二十余艘，又将十二艘大船各装上十万斤石块沉入江中，从而使得这一带的江水相对变浅。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壮丁在岸上列队。

两广总督卢坤对律劳卑进行了反驳。但鉴于天朝的大官不直接与夷人对话，所以他是通过给公行“命令”来进行的。这和律劳卑通过给英国的商会会长写信与清政府交涉如出一辙。

两广总督给公行的“命令”相当严厉，大意是：

英国派政府官员来取代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那是他们的自由。我朝沿袭旧制，规定由公行与夷人接触，这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

的访问和使节朝贡外，我朝与外国从未有过直接的联系。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事前没有通知，本人也没有携带任何委任状。对于这个新问题，总督需向朝廷请示。然而，英方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更甚者，英方竟然无视我朝律法，将军队与武器带入商馆（9月6日有少数英国人武装进入商馆），并炮击我方炮台，强行侵入内河……凡此种种决不能姑息……天朝的军队勇猛无敌，枪炮武器更是堆积如山，一旦我们出兵，看他们小小的军舰如何抵挡！倘若律劳卑有心悔改，撤回军队，遵守旧制，我还可以稍加考虑；倘若其愚昧不悟，我将不再容忍。天朝一旦出兵，他们将自食其果！

律劳卑不得不屈服。这一年，东印度公司退出了舞台，中英之间开始了自由贸易，来广州的英国船剧增，而且大多属于资本较少的贸易商，自然无法忍受长期停止贸易。事实上，这些商人最初认为，从长远来看，当时是该对清采取强硬措施，但后来他们的态度渐渐软化了。律劳卑虽然卧病在床，但也知道这种倾向和氛围。

只要律劳卑一个人离开，就能恢复中英之间的贸易。

律劳卑决定离开广州。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力让身在广州的同胞们继续忍受恶果，尽管他到广州还不到两个月。律劳卑发着高热提起笔，在命令上签了字，让两艘英国军舰撤回到伶仃洋。

离开广州时，律劳卑给在广州的英国人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即将离开此地，既因清朝军队的压迫，也因英国商人受到的凌辱。英国国王和清朝皇帝一样神圣，然而总督的措施损害了英国国王的威严。现在总督可以任性地采取看似勇敢的行动，但总有一天，英国国王会惩治他……

律劳卑已经病得无法行走，只能由两名部下扶着走到码头。

9月26日，他躺在担架上抵达澳门。9月29日，两广总督满意地下达了开舱（恢复贸易）命令。

贸易恢复正常。

1834年10月11日，律劳卑去世了。在他卧病期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求教堂不得敲钟以示关怀，可惜未能起作用。

清朝方面暂时取得了胜利。不过，虎门内河的各处炮台，连两艘护航舰都拦不住。这件事令清政府震惊。道光皇帝退回了从广州送来的奏折，他愤怒地批示：

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

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

六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此次“律劳卑事件”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

---

[1] 旧指翻译人员。

第四章 论争

广东之梦

在广东的粤秀山，有一所名叫“学海堂”的书院。这是道光四年（1824年），时任两广总督的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创立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海堂停办。在这八十年间，学海堂不仅是广州的学术中心，而且刊印了众多好书。

主持学海堂的吴兰修是嘉应人士，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举人，曾做过粤秀羊城书院的监院。这个吴兰修通过朋友何太清的介绍，与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有书信往来。

太常寺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官府机构的名称。通常，带“寺”字的官府机构负责处理与皇室相关的事务。太常寺负责祭祀，正职被称为“卿”，副职被称为“少卿”。少卿是正四品，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疏。

眼见着国家日益衰微，许乃济也十分忧心，摸索重新振作之法。在他看来，最可怕的是白银外流；要想拯救衰世，必须健全国家财政。关于鸦片问题，他认为只讲原则是无济于事的。差不多二十年前，当时广州的粤秀书院是官学。他曾在那里教书。他的主张是：当前的问题都不了解，何谈鸦片问题！

许乃济在北京。他希望能够通过友人何太清，听取当地有志之士的意见。这里所说的“当地”，自然是指广东。

针对许乃济的疑问，吴兰修认为，严禁鸦片的制度可以稍稍松弛，这样便可以解决众多困难。

当时学海堂的老师，包括熊景星、仪克中在内，基本都持同样的观点。“弛禁”，即松弛禁令，是学海堂的学者们共同的观点。

同为广州官学的还有一所名校—— 越华书院。该校的办学历史比学海堂还要久。越华书院的陈鸿墀是严禁论的急先锋。

总之，对于鸦片问题，以这两所书院为代表的两派所持的观点似乎是对立的。

学海堂的背后，或许有公行商人的影子。当然，这只是推测。

广州是富裕之地。到广东赴任的官员眨眼之间就被当地的商人笼络的情形屡见不鲜。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一旦被任命为广东的官员，周围人无不额手称庆。这确乎是一种“去广东赚大钱”的兴奋感。

广东的大富豪都是公行的成员。伍绍荣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富豪，甚至可以与当时世界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比肩。这虽是广州夷馆中外国文献资料上的推测，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诚如前文所述，其他公行成员，有的已经濒临破产。起死回生之法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由行商垄断鸦片贸易。由此可见，鸦片弛禁论与公行的利益不谋而合。

以伍绍荣为代表的公行与以吴兰修为代表的学海堂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如今很难举证。但是，吴兰修向许乃济进言所提的弛禁论，同样牵扯鸦片合法化的问题。这一点正是行商热切期盼的。

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那就是“产学协同”[1]。

许乃济参考吴兰修的见解写了一份奏疏。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份奏疏被呈到了皇帝手中。由此，鸦片问题被正式搬上台面，因此可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

事实上，几乎在同一时间，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等人也上奏疏，要求松缓吸食鸦片的禁令。不过，王玥的主张仅限于鸦片的吸食，并未像许乃济的奏疏那样引起争议。

---

[1] 现代日本教育界提出的口号，主张产业界与学术界合作，以培养出适应技术革新的人才。

许太常奏议

许乃济关于鸦片弛禁论的奏疏，冠以其官职名，被称为“许太常奏议”。

虽说是“弛禁”，但也不是对鸦片无条件地容忍。在奏疏的开头，许乃济列举了鸦片的危害，主张必须根绝鸦片恶习。但是禁绝鸦片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现在尽管有严厉的禁令，但几乎没能实行。既然如此，不如让有名无实的禁令更现实一些，循序渐进地改进，并从经济政策方面加以探讨。这就是“许太常奏议”的着眼点。

下面来看看他的观点。

许乃济在奏疏中明确指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在对鸦片的性质、种类进行说明之后，展开了如下论述：

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其后始有例禁。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

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

嘉庆时每年约来数百箱，近年竟多至二万余箱……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圆……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夷商向携洋银至中国购货……近则夷商有私售鸦片价值，无庸挟赀洋银，遂有出而无入矣……然向来纹银每两易制钱千文上下，比岁每两易制钱至千三四百文，银价有增无减，非银有偷漏而何？鹾务易盐以钱，而交课以银，盐商赔累甚重，遂致各省鹾务，俱形疲敝。州县征收钱粮，其赔亦复相同。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贻害将不忍言。

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

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 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

或谓有司官查禁不力，致令鸦片来者日多。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

道光元年，两广督臣阮元，严办澳门屯户叶恒树，夷商无可托足，因自贩于零丁洋……水路四通……由窑口兑价银于夷馆，由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亦曰扒龙，炮械毕具。亡命数十辈，运桨如飞，所过关卡，均有重贿，遇兵役巡船向捕，辄敢抗拒，互致杀伤……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

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海内生卤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

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

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

臣以一介菲材，由给事中仰沐圣恩拔擢，历官中外，前任岭表监司，几十年，报称毫无，深自愧恨。而于地方大利大害，未尝不随时访问。因见此日查禁鸦片流弊，日甚一日，未有据实直陈者。臣既知之甚确，曷敢壅于上闻？

伏乞皇上敕下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密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

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叠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前明淡巴菰，来自吕宋，即今之旱烟，性本酷烈……内地得随处种植，吕宋之烟，遂不复至，食之亦竟无损于人。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广东省情形言之，九月晚稻，刈获既毕，始种罂粟，南方气暖，二三月便已开花结实，收浆后乃种早稻，初无碍于地方，而大有益于农夫……

一看这样的弛禁论调，便立刻使人产生批判的念头。

首先，将鸦片等与酒色同列、与药用的乌头类比，这实属偷梁换柱。而且，他认为只要作为统治阶级的文武官僚及其子弟，以及侍奉他们的兵丁没有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就万事大吉。这分明是只顾自己的自私之念，任由“游惰无志”之辈、“愚贱无职事之流”自生自灭，这种主张相当残酷，毫无人道可言。

对于这份“许太常奏议”，不妨听一听当时批判者的原话。

驳斥弛禁论

向皇帝呈递奏疏，如果上奏的意见与皇帝不谋而合，自然万事大吉；如果触怒皇帝，则有可能被贬或革职，甚至掉脑袋。因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凡上奏者，无不立马想到司马迁因替李陵将军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被处以宫刑。

因此，关于弛禁论的奏疏，许乃济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写。兹事体大，他定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充足的准备。

许乃济请求皇帝命令广东的官员进行调查。显然他事先已经联络了广东官员。他曾担任广东学政方面的官员。除了何太清，他和当地其他有势力的人物自然也有联系。他写奏疏，一定是预先采取了某些措施。

另外，对公行而言，弛禁论将带来巨大的利益。因而不难想象，许乃济和公行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北京紫禁城里，每天早朝时，在军机大臣的辅佐下，皇帝都会亲自批阅臣子呈上来的奏疏。许乃济的请求得到了应允，皇帝下令广东的官员仔细调查后再次上奏。

这年十月上旬，广东传来奏疏。果不其然，该奏疏赞同弛禁论，认为应当重新制定规章，并提出了九条草案：

一、以货易货，不得用银交易。即便鸦片进口过多，不足的部分也严禁用银交易，应交由公行代为保管。待下一个交易季，返还给夷商。

二、水师巡船不得假查禁之名出洋滋事。

三、夷商出于支付运费等需要带来的银钱，返航时仅准带回三成。

四、鸦片作为药材已取得进口许可，故要与其他商品一样，交由公行管理。为防止垄断现象的出现，不必另设局专办。

五、额税宜遵旧制，不必加赠。税愈轻，甘冒险走私者愈少。

六、弛禁一旦实现，鸦片价格必下跌，故价值不必预定。

七、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无执照者视为走私，走私为漏银之源，务必严明禁止。

八、民间栽种罂粟，可稍宽严禁。仅限在山头角地和丘陵地区种植。

九、官员、士子、兵丁，严禁吸食鸦片。

由此可以看出，该奏疏实则是对“许太常奏议”的补充，二者相辅相成。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也不难推测，为了加上第四条，公行定然付出了巨额贿赂。

对于这些弛禁主张，反对意见也纷至沓来。内阁学士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先后上奏疏，驳斥了弛禁论。可惜这两篇奏折的原文已经失传。《中西纪事》曾引用许球奏疏，但也只有部分内容。

许球指出：“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他还建议将严禁鸦片一事通知英国国王。

对于这篇奏疏，道光皇帝上谕道：“鸦片烟来自外夷，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画，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

这段话说得非常含糊。

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写了奏疏，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主张进行了严厉驳斥。该奏疏如今保存完整。以下是其概要：

即便按照旧例缴税，两万箱鸦片也只需十二三万两，就算翻倍也不过二十余万两，再翻一倍也就五十余万两。弛禁课税之说，实则是为小利而伤大体。

外夷售卖鸦片就是为了得到银子，因而不可能同意以货易货，他们会从暗中掠走内地之银。解决漏银问题，关键是监察。如果监察认真，那么鸦片是可以禁止的；如果不认真，即便弛禁，禁止银两外流的规定也会形同虚设。

鸦片之利是其他农产品的数倍，如果允许种植罂粟，那些无知小民必将弃农逐利。现在人口日增，而粮食产量却日减，即便每年都丰收，也无法养活所有人，遑论遇上灾害年，恐怕更是一筹莫展。

愚民自缩寿命，不足深惜—— 这种言论实在叫人痛心疾首！皇恩浩荡，难道不该惠及所有百姓吗?

说什么禁之无效，禁不禁都一样，这并不是法律之罪过，而是执行者之罪过。现在海内平和，但仍会发生奸盗之事。禁止奸盗但仍不时发生，从未听说过因此就弛禁奸盗的论调。何况鸦片流毒更甚，弛禁鸦片实属无理之论。

淡巴菰的禁令解除后也没有害处，鸦片也应当解禁—— 烟叶虽然没有益处，但不至于使人“废事耗神”，鸦片怎能和它相提并论！

所谓禁严贿赂多，禁弛贿赂少，这是纲纪问题。奉法得人，那么禁烟也不会有贿赂，反之，就算弛禁，贿赂也仍会横行。

袁玉麟在奏疏结尾写道：“立斥弛禁之议。仍请敕下在廷诸臣悉心妥议，于烟入银出，有可永远禁绝之方，各抒所见，条奏以闻，皇上择要而施。”

如此激烈的批判，彻底埋葬了弛禁论。此后，再无人上奏弛禁建议。

广东奏复的带头人—— 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赞同弛禁，或许是考虑到公行以“振兴地方”为口号掀起的弛禁运动；反对弛禁的舆论出现后，他便放弃了弛禁主张。在四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他和钦差大臣林则徐一同为禁绝鸦片尽心竭力。

弛禁论销声匿迹，紧接着出现的是严禁论。“许太常奏议”提出后两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提出严禁奏议，对弛禁论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严禁论的定本

前文中援引了许多奏疏。清代是公文政治，大臣的奏疏和皇帝的批示，都是相当重要的资料。所谓一个人有政治才能，首先就是指其能写出好文章。

前面所说的宣南诗社并非单纯的文学爱好者协会。其中大多数人奉行公羊学，自然会不可避免地议论经世济民的问题。不难想象，这群人大概会如何评价彼此的文章：

“此句太过简单，不足以表意。”

“此处若能如此修改，意思便一目了然了。”

“此论点太突兀，应当稍做铺陈。”

他们相互点评和切磋，目的就是为了写好奏疏。这是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必不可少的能力。如果自己的方案没有被皇帝采纳，那么就算执行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所以首先要培养写作能力。

在宣南诗社的同人中，奏疏写得最好的，便是黄爵滋。

黄爵滋，字德成，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道光十年（1830年）宣南诗社成立时，他三十八岁，任翰林院编修。之后，他担任过科举的考官。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出任福建道监察御史[1]，道光十五年（1835年）被擢升为鸿胪寺卿，正四品。鸿胪寺是掌管朝廷典礼的机构。

据《清史稿》记载，黄爵滋“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

黄爵滋比林则徐小八岁，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四十六岁，正是八年前宣南诗社成立时林则徐的年纪。而此时，林则徐已经由江苏巡抚升任湖广总督。

命运将这两位社友紧密地联系起来。林则徐之所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也是由于黄爵滋的奏疏。

弛禁论被压制之后，严禁论纷纷出现，但大多停留在“塞源遏流”等抽象的议论层面。黄爵滋的奏疏之所以能够成为严禁论的定本，正是因为其提出了具体果断的措施—— 处死吸食鸦片者。他从白银的外流说起——

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指出，白银外流是因为鸦片走私。他在描述完鸦片泛滥的现状后，逐条罗列了以前措施无效的原因。

第一，尽管严查海防，但收效甚微，因为“沿海万余里，随在皆可出入”。

第二，禁止通商是无法阻止白银外流的。因为鸦片原本就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来的。鸦片船停在外洋，自有奸人搬运。

第三，惩办鸦片商贩也无济于事。因为地方贪官与世家大族的不肖子弟互相勾结，“未有不庇其同好”。

第四，对罂粟种植实行弛禁政策，并不能防止白银外流。倘若真如弛禁论所说，国内的鸦片毒性弱，那么为了牟利，一定有人会想方设法弄到国外毒性更猛烈的鸦片。

面对如此现状，鸦片能否被禁止?

黄爵滋的回答是：否!

他在奏疏中写道：“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他认为，鸦片盛行是因为吸食者众多；没有吸食者就没有买卖，鸦片自然就不会进来了。由此，他提出了“吸食鸦片者死罪”的建议。这可以说是他的奏疏核心之所在。

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然皆系活罪。

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黄爵滋在奏疏的最后写道：“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皇帝读完黄爵滋的奏疏心有所动，令人将这份奏疏的抄本分送给各地的总督、巡抚，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以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心中已有盘算—— 任命奏复最佳者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开展禁烟工作。

---

[1] 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四年，黄爵滋为福建、陕西、江西、山东等地监察御史。

第五章 点火

皇帝奋起

如果是写一部小说，那么直接写成公羊学派的革新官僚和保守的富裕阶层之争，或许更有趣。前者是宣南诗社，后者是公行。换言之，这是宣南诗社和公行之争。

中国曾拍摄过一部名为《林则徐》的电影，主题自然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在制作过程中，相关人员进行了大量讨论，被记录并且保存了下来。关于如何选择林则徐的对立人物，主创者可谓煞费苦心。

为了便于观众理解，最好让正派和反派泾渭分明。正派自然是指林则徐。但是如何选择反派呢?

有人提议伍绍荣，但林则徐是钦差大臣，将他的对手设定为一介平民，似乎有失平衡，因而未被采纳。

在极端的官尊民卑的世道，如果伍绍荣被林则徐召见，首先就得下跪。

从表面上看，两人的身份过于悬殊。但是伍绍荣拥有雄厚的财力，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其分量足以和钦差大臣相匹敌。

电影主创者放弃伍绍荣后，一度考虑将投降派的代表、水师副将韩肇庆设为反派。此人可谓狡诈奸猾。他纵容鸦片走私，收取百分之二的“默许费”，却因缴获鸦片的“功绩”而升官。不过，尽管此人身居高位，却是由商人的财力豢养的，地位显然在伍绍荣之下。

最终，公行的监督机关—— 粤海关监督豫堃[1]被设定为反派，与林则徐激烈对立。广州的高官就鸦片问题和海防事宜联名上书之时，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东水师提督和粤海关监督都落了款。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豫堃是不是投降派？私底下，豫堃和林则徐关系很好。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的时候，豫堃是江宁织造。从林则徐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苏州还是在广州，两人都像亲戚一样来往密切。林则徐左迁离开广州之时，还把行李交给豫堃保管。总之，两人并不像电影所表现的那样相互仇视。

豫堃负责监督公行，或许有时立场会偏向公行，但并没有证据说明他有明显的投降行为。豫堃在电影中的角色，不免使人觉得可怜。

闲话说了那么多，让我们言归正传。

如果在宣南诗社和公行之争中，写尽双方的谋略对策，想必会更加有趣。

公行的策略是有迹可循的。许乃济的弛禁论和广东奏疏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而宣南诗社方面，黄爵滋的严禁奏议和林则徐的起用，似乎也过于巧合了。

最初，许乃济上奏，希望能够让广东众官员负责调查。他和这些官员勾结的可能性很大。而黄爵滋这一方，并没有说希望起用林则徐云云。

起用谁来解决鸦片问题，要由道光皇帝来决定。由于辅佐的军机大臣以保守派的穆彰阿为首，故而道光皇帝认为起用革新派的林则徐为上策。

由于国库拮据，道光皇帝早已有心解决鸦片问题。黄爵滋的奏议可谓恰逢其时。道光皇帝心中大喜：“就是这个！”但是担任钦差大臣的，须是老练的司政官，而黄爵滋无论是资质还是经验都不足。于是，道光皇帝命人将黄爵滋的奏疏抄本送至各地，以征求意见。

二十多名总督、巡抚、将军之中，完全赞成黄爵滋奏疏的只有四人。他们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

巡抚桂良。

其余官员皆在原则上赞成严禁鸦片，但认为犯者死罪未免过于严苛。就连两广总督邓廷桢都觉得，死罪太过，不如改为墨刑[2]。一个人如果受过墨刑，就无法再在人前露面。这也是相当严酷的刑罚。

从当时的疆臣年表来看，大部分官员是满族。而完全赞成黄爵滋奏疏的四人中，只有河南巡抚桂良是满族。后来与鸦片战争关系密切的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以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满族高官都认为死刑不妥。

可以说，严禁鸦片且犯者死罪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就当时的状况来看，吸食鸦片是公开的，没有人会认为这是犯罪。这就像日本曾一度盛行黑市交易大米，谁也不认为这是违法的。黄爵滋的严禁论正是要推翻这种现状。

除了公开吸食鸦片，官场贿赂成风、奢靡浪费，以及贵族过着世袭的舒适生活，也都是现状。要推翻现状，就意味着这些人的利益将受损。因此，他们必然会趋于保守。相比之下，弛禁论就更接近现状，因而得到大多数保守派的支持，且公行能直接受益。总之，对他们来说，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改变现状，都是危险的。

满族的官员认为，维护过去的旧体制才是上策。他们一路走过来，就像走钢丝一般，稍微有些摇晃，都意味着危险。因此，对于吸食鸦片一事，大家也都放任不管。总之，现状不可改变。

满族的官员都这样想，自然不可能赞同把吸食鸦片的人判死刑，但道光皇帝是例外。他作为皇帝，和满族大臣的处境还是不同的。

彼时，军机大臣以下的满族官员，越是担任要职、有权有势的，就享受越多的荣华富贵。他们一面剥削百姓，一面蚕食国家钱财以自肥，从而导致国库空虚，财政捉襟见肘。而在半个世纪以前，清朝正是康乾盛世。

人们动辄今昔对比，道光皇帝自然难以忍受，甚至为此动怒。“为什么轮到朕就必须节俭呢！”最大的原因当然是购买鸦片导致白银外

流。而这些白银，原本是应该进入国库的！税收没有增加，百姓又因吸食鸦片而丧失了劳动能力。

道光皇帝对鸦片深恶痛绝，决心要彻底禁止。他拿亲近的人开刀，将皇室宗族中吸食鸦片者拎出来示众。

首先是他的侄子庄亲王被道光皇帝惩罚。接着，辅国公溥喜的称号被削，三等伯爵贵明的爵位被削。

另外，曾经上奏弛禁论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被革职，由四品降为六品，并以“休致”[3]。

接着，道光皇帝下令各省严惩鸦片犯。各地官员惊慌失措，开始到处抓捕鸦片犯。由于吸食鸦片是半公开的，想抓多少就能抓多少。不过事实上，被抓的大多是没有背景、没有权势、不曾贿赂的人。

要想根除鸦片，必须以“蛮勇”来对待这项工作。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初八上谕：“务当振刷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

---

[1] 字厚庵，满族。曾任江宁织造，驻苏州，后任粤海关监督。

[2] 古代刑法的一种，刺字于被刑者的面额上，涂上墨炭，染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

[3] 清制，朝廷常对年老不能胜任的官员给予“原品休致”。如因年老不称职，而被命令退休或加以处分，则“勒令休致”。

林则徐出场

前面已经说过，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疏抄本分送到各地，之后亲自审阅各地长官的奏疏。快马从武昌送来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疏。

“这篇最合朕的心意！”

林则徐在奏疏中不仅完全支持黄爵滋的奏议，还进一步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由于长期从事实际的行政工作，林则徐不谈空想，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他认为禁烟工作可以分阶段完成。例如，黄爵滋提到给戒烟者一年的期限。对此，林则徐做了补充，大意为：为劝令吸食鸦片者改过自新，将一年之期分为四个阶段，罪名随着阶段的递增而加重。在第一阶段内自新者，可以免罪；在第二、第三阶段内自新者，可以酌情减轻刑罚；如果过了第四个阶段仍不能自新者，或者曾经改过但又重新吸食者，将“置诸死地，诚不足惜矣”。此办法也同样适用于开办烟馆者、贩卖鸦片者以及制造烟具者。严苛的刑罚有时会使无辜的人获罪，但对于吸食鸦片者，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对于这类嫌疑犯，根本不需要审讯，只要令其安静地坐着即可。但凡鸦片上瘾者，时间一到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种“审讯”可以说是最简单明了的。倘若有人试图陷害无辜之人，也很容易就能真相大白，那么告发者将受到严惩。

对于禁烟一事，林则徐可谓言辞犀利。他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很显然，林则徐在警示道光皇帝：鸦片输入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之大，鸦片亡国。

道光皇帝自然知道黄爵滋和林则徐同为宣南诗社的成员。一个是提出问题者，一个是解决问题者，两人不谋而合虽属于偶然，也未必尽是偶然，毕竟在同一个集体之中。

道光皇帝决定召见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初七，林则徐收到了吏部的公文，要求“来京陛见”。接到公文，林则徐本该立即动身，但是十月初十是皇太后万寿，届时总督将负责阅兵，因而十月十一日他才从武昌出发。

林则徐从武昌走到北京，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十一月初十，林则徐抵达北京城外的长辛店，几乎没怎么休息，翌日便上朝觐见了。他清早进了乾清宫。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道光皇帝恩准他坐在毡垫上，垂问时间达三刻钟之久。这里的“一刻”为十五分钟[1]。第二天，他再次被召见并垂问二刻。

十一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下旨，对林则徐特加恩宠—— 紫禁城赐骑。也就是说，林则徐可以在紫禁城中骑马。这是十分少有的。由此可见，道光皇帝十分信任林则徐。这一日，林则徐身穿朝服，上有代表三品以上的九蟒五爪花纹；外套补褂，上面绣着代表一品文官的仙鹤；腰系朝带，上有四个镶嵌着红玉的方形镂金玉；项上戴着珊瑚朝珠（上朝时，须用右手紧握朝珠，以使其保持“安静”）。但是，林则徐骑在马上，双手握着缰绳，因而朝珠“吧嗒”作响。

十一月中旬，北京已经相当寒冷了。“朝廷”一词源于进行早朝的地方，寅时三刻（凌晨四点）骑马上朝，确实够早的。自然，宫中灯火通明。仪仗从天安门排到中门。林则徐打着杏黄伞和青扇、飞虎旗，旗枪四根、青旗八杆，前引二人、后从八人。马身则装饰着华丽的缨子。

正所谓“南船北马”。北方人爱骑马；而南方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不擅长骑马。林则徐是福建侯官县人，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且又是文官，骑马技术生疏。传言说，他骑马进紫禁城，神态轻松，看上去十分威武，但恐怕事实上，他双手紧握缰绳，内心相当紧张。

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道光皇帝对他说：“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林则徐连忙叩头谢恩。

椅子轿又叫肩舆，是在八抬的轿子上放一把椅子。人坐在椅子轿上要比坐在马上更高。这也是破例。一连八天，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召见。这更是前所未有的。

心情振奋的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相当满意，恨不得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他。

道光皇帝给林则徐这么多破例待遇，恐怕是想给大臣们制造一个印象—— 林则徐拥有特殊的权限。而一旦林则徐被赐座和允许坐椅子轿的事情传出宫墙，便能向普通百姓显示林则徐的权威。这正是道光皇帝的用意。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得到敕令：“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差大臣”是由皇帝专门派出办理某事的官员。“关防”即公章或盖有这种公章的文书。

钦差大臣的关防和皇帝的命令一样具有威慑力。道光皇帝把禁烟相关的事宜全权交给了林则徐，还把广东水师的指挥权也交给了他。

在京期间，林则徐可谓十分繁忙。他不得不去各处拜访相关官员。在他的日记中连续几日出现“出城拜客”之语。此外，他每天还要冷静地考虑好第二天觐见时如何答话。宣南诗社的同人大概也知道他忙碌，因而似乎并未前去打扰。林则徐在烧酒胡同下榻，龚自珍只去拜访过一次；而魏源这一年在扬州，自然连面都没有见到。



林则徐画像

---

[1] 古代有纪时法，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为现在的两个小时。每时辰分为八刻，又区分为上四刻、下四刻。

事势有难言者

龚自珍去拜访林则徐时，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了自己对于鸦片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收录在他文集中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提出了守战之策，论述了决定、答难、归墟等诸义，十分艰涩难懂。龚自珍在文章中慷慨陈词，支持禁烟，坚决反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同时，建议对破坏禁烟的贪官污吏和贩烟、制烟、吸食者严厉镇压。其概要是：吸食鸦片者要予以绞首，制造者、贩卖者则处以斩首，要将吸食鸦片的士兵斩首。禁绝鸦片，必须依靠武力。把夷人全都赶往澳门，只留一处夷馆以供互市……

龚自珍甚至认为，在禁烟一事上，即便是仆役和亲近之人，也应当视为大敌那样慎重。他比林则徐小七岁，两人的品级相差很大。但是他早就洞悉，林则徐此次广东之行意义非凡。对于林则徐而言，广东人生地不熟。作为诗社的社友，龚自珍对林则徐单独去广东感到忧心，希望能为其尽一份绵薄之力。

龚自珍向林则徐表达了这样的意愿——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去广东，为你效劳。他当时是礼部的主事，六品。事实上没过多久，他就辞官而去。可见他辞官的想法由来已久。

当时的高级官吏身边都有自己的幕僚，相当于私人秘书。据说，处理实际行政工作的并非衙门里的下级官吏，而是这些幕僚。因是私人秘书的性质，并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也无须得到上级任命。只要林则徐愿意，龚自珍随时都可以成为他的幕僚。龚自珍是个杰出的人才，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文牍政治时代，对林则徐是很有帮助的。

然而林则徐因公务繁忙，在京期间并未答复龚自珍。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焚香九拜，打开封得严严实实的关防大印，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广东之行。在途中，他给龚自珍写了复札：

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听。

林则徐也是写文章的高手。事势之微妙，不可能无法用文字表述。他不过是借此委婉地回绝龚自珍。

尽管林则徐获得了紫禁城赐骑的荣耀，又连续八天得到皇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恩宠极盛，但他仍保持清醒。他深知前路多舛。从北京的气氛中，他已然察觉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高官对于禁烟一事态度冷淡。

弛禁派以道光帝的亲信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为主要代表，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辅助者，反对禁止鸦片。他们主张弛禁，推行“抚夷媚外”政策，并包庇走私烟贩和受贿官吏。

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中提到，在拜命为钦差大臣时，林则徐说：“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柄臣”即拥有权柄的大臣，此处大概指的是宫中的军机大臣和宫外的直隶总督。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在外立功，皇帝身边的权臣会因嫉妒而进献谗言。宋朝正因为有权臣秦桧的挑唆，才导致岳飞北伐功亏一篑。这是相当典型的例子。林则徐不可能不想到这些。而且在他即将赴任的广州，官员大多通过默许走私鸦片而中饱私囊。他作为钦差大臣主持禁烟，很有可能被孤立。

此外，英国的武器制作精巧，船只打造坚固。这是清朝望尘莫及的。

林则徐并非井底之蛙。早在六年前，他作为江苏巡抚上任时，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就曾闯进江苏境内的黄浦江。虽然那只是一艘商船，但装备之精良，令水师的高级将领时常谈起。

总之，林则徐的敌人是相当强大的。

林则徐早就预料到，一旦广东形势紧迫，英国就有可能出兵。这一点，他曾告诉道光皇帝。这在他后来左迁途中给友人的信中曾提到过。

尽管在当时，他得到了道光皇帝的信任，但皇帝素来没有定性，随时可能改变主意。因此，广东禁烟失败的可能性更大。林则徐出发时对侍郎沈鼎甫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说完两人相顾流泪。正因为这样，他不想把朋友卷进去。或许他是想保住他们，就算自己失败了，也好后继有人。

以上，想必就是林则徐“难言”之言。这一切似乎可以表明，他不信任道光皇帝。

林则徐南行

封建社会，官尊民卑之风盛行，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有人说，旧中国只有士大夫阶级和平民阶级，或者也可以说是“读书阶级”和“非读书阶级”。而读书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因而也可以说，旧中国只有官与民。

中国古代素来就有所谓的“贱民”，不过人数并不多，如生活在广东水上的疍户、街头卖唱的乐户、世代以乞讨为生的细民等。和一般的贫苦农民不同，贱民不仅穷，且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在旧中国，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当官。

大官外出时可谓风光威武。事先会有小吏沿途通知。这就相当于催促各地做好接待准备，之后会有人来检查是否准备妥当。大官一面从政府领取足够的差旅费，一面又在各地免费征发夫役。而这些夫役，又都借着主人的威风，到处索取钱财，以弥补自己的无偿劳动。因此，老百姓苦不堪言。

动身前往广东之前，林则徐也按照惯例，向沿途各地衙门发出了传牌：

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射影，立即拿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本部堂系由外任出差，与部院大员稍异，且州县驿站之累，皆已备知……所

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縻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

从这篇传牌可以看出，当时廉洁奉公的官员何其少！在此之前，还没有过这样的传牌。各地官员接到这样的文书，想必无不大吃一惊。

钦差大臣一行人进入江西省境内后，常因风雪而耽误行程。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春节，林则徐是在船上度过的。

翌日，他到达南昌，又因雨雪天气而逗留数日。其间，林则徐拜访了对海运有着丰富经验的公羊学泰斗包世臣，并聆听了其意见。包世臣曾向林则徐提出“止浊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的策略。他在鸦片战争时期坚决抵抗侵略，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做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由此可见，林则徐此次出行不但相当简朴，而且还十分注意实地调查和思考对策。

正月十一日，尚在江西境内的林则徐派出“捷足”，即信使，向广东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重要指令。他拟定了一份名单，罗列了广东鸦片走私的重要罪犯和次要罪犯，下令将这些人逮捕。不过名单中的大多是为走私行方便的下级官吏和士兵。

于是，在钦差大臣到任之前，广东就已经刮起了逮捕风暴。那些搞鸦片走私的人，无不心惊胆战，害怕这次会遇上一个铁面无私的钦差大臣。在夷馆中的外国人也都觉得这位姓林的钦差大臣不好对付。

钦差大臣林则徐于正月二十五日（3月10日）抵达广州。此时，广州已经很暖和了。

礼炮九响，以迎接这位皇帝钦点的大人。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豫堃、广州将军德克金布、副都统左翼奕湘公爵以及右翼英隆等前来迎接。

林则徐事先已经发函，希望住处能离夷馆近一些。因此，越华书院被定为钦差大臣的临时官邸。前面已经说过，这所书院与弛禁论大

本营的学海堂齐名。林则徐在这里会见众人，听取各方意见，提出疑问并力求解答。

道光皇帝曾要求林则徐："鸦片绝对要禁止，但不要和外国人引起过多的纠纷。"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林则徐因此而忧虑。不和外国人发生摩擦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把重点放在禁烟上。他已经做好了为此被免官的思想准备。

到达广东的第九天，林则徐发出两道谕帖。

一道是给公行的，命令其在三日之内，让夷人出示甘结（保证书），汉文和夷文各一份，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入官"。"正法"即处以死刑。林则徐严厉地警告公行："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

另一道谕帖题为"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由于钦差大臣也不能直接与夷人接触，他将这道谕帖交给了公行。

在这篇谕帖中，林则徐谴责了夷人的鸦片贸易："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接着，他又正告夷商：皇帝已经下决心要根除鸦片，并颁布了严厉的禁令—— 贩卖鸦片者、开设烟馆者，以及吸食鸦片者，都要被处以死刑。"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

鸦片要全部没收！此令一出，外国人惊慌失措。

林则徐不仅要他们出示保证书，还强调了这一命令之非同寻常："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

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

可以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在此处被点燃。

第六章 虎门销烟

实权的行使

公行面临的问题相当棘手。

外国人来中国是为了贩卖鸦片，然后购买茶叶。如果携带鸦片，就要杀头。那么他们自然不会轻易签署保证书。而且夷人存放在伶仃洋上的鸦片将被全部没收。

令人头痛的是，在清政府看来，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自己对等，也不存在所谓的外交关系，自然也没有负责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与夷人相关的一应事务，都是通过公行进行的。例如，任何外国船只进入广州，都需要一名公行成员作为保证人。一个国家的外交和通商，由一个民间公会组织来负责，不是一种常态。公行垄断贸易，固然令其欢喜，可一旦出现后果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钦差大臣只给了三天期限。公行总商伍绍荣面容憔悴。对于如何解决这次的问题，他看不到一点希望。

说起来公行也是冤枉。公行是得到正式许可的特许商，不能从事鸦片贸易，但时常被夹在由鸦片引发的纠纷之中。曾有一家叫同泰行的，因其担保的一艘外国船只被发现藏匿鸦片，从而被罚了款。罚款金额是货物金额的五十倍！有的公行成员发牢骚：“如果实行弛禁论，就不用受这份罪了！”

夷人拒绝了由公行转交的谕帖，并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

谕帖给出的截止日期是二月初七（3月21日），正好是春分。或许是这个缘故，林则徐在这一天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翌日，他派了代表前往十三行街。

伍绍荣辗转于夷人之间做着说客，但大部分夷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的官员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过是装模作样吓唬人，想要捞点贿赂而已。因为在过去，只要给官员塞点钱，什么样的事都能摆平。

为了向外国人解释“钦差大臣”之特殊，伍绍荣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告诉外国人，只有非常时期，发生相当严重的问题时，皇帝才会任命钦差大臣。

外国人这才明白，此次的事情恐怕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钦差大臣说出的话，是不会轻易收回的。那就给他一点面子？夷人咬咬牙，稍稍做了让步。但他们压根不谈保证书的事，只是说愿意上缴储存的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而根据林则徐得到的消息，存放在趸船上的鸦片约有两万箱。因此，英方提出的方案立刻就被否决了。为了追查线索，林则徐对夷馆中的一名英国人发出了逮捕令。

这名英国人正是宝顺洋行的颠地（John Dent）。

林则徐原本想逮捕的是怡和洋行的渣甸（William Jardine），以儆效尤，但是这个渣甸在林则徐到任的五天前已经回英国了。因此，颠地成了他的替死鬼。

当然，逮捕令并非直接发给夷人，而是发至县衙，再由县衙传给公行。而当公行向夷人传达命令时，遣词造句明显变了样。原命令是：速将颠地一犯交出。经过公行的“修饰”则变成了“招颠地氏进城”。

但是夷人还是嗅出了危险，觉察颠地有性命之忧，拒绝服从命令。

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是海军上校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爵士。钦差大臣到任时，他正在澳门。他听闻广州十三行街气氛紧张，匆忙赶回了广州。

义律属于鹰派。在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报告中，他曾建议：“强硬的措辞和行动，可以扼住当地政府轻率的气势。”他仗着大英帝国的权威，根本不把清朝放在眼里。

3月24日，义律昂首走进夷馆，首先将英国国旗高高地挂起来。接着，他立即给公行写了一封信：我同意让颠地先生去，但是有条件—— 我作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将和他一同前往。同时，我们需要一份盖有钦差大臣大印的文书，保证我们不会受到片刻的隔离。

林则徐早已不把颠地当回事了。他本就准备包围夷馆，迫使对方屈服。而期限已过数日。他之所以没有包围，是因为主将不在。既然现在义律进了夷馆，那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林则徐再次向伍绍荣下达谕帖，大意为：之前已经下令，要求夷人上缴所有的鸦片，并且在三日内立下保证书，但至今没有答复。因此，对停泊在黄埔的外国船只实行“封舱”，停止买卖，禁止装卸货物。工匠不得受雇于夷人，船只、房屋等不得租借给夷人。违反者将以私通外国罪论处……夷馆的买办和被雇佣者，一律撤出！

其实，要搜查和禁止鸦片，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对伶仃洋上的趸船进行检查，但依靠清军的实力，这是很难办到的。实际的鸦片贸易是在夷馆中以立券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林则徐才包围夷馆，逼迫夷人自行交出鸦片。

天之所厌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的办事处，并没有设在被称为英国馆的原东印度公司，而是设在了法国馆和美国馆之间的中和行。中和行的主人是公行的成员潘文寿。夷人不得在中国置办不动产。即便是夷馆，也仍是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不过是租给夷人而已。

上千官兵包围了夷馆，彻夜吹喇叭、敲锣鼓。夷馆中有二百七十五名外国人。夷人不得在广州过冬的禁令形同虚设，而不得携带妇女的禁令倒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夷馆中的外国人全部是男人。不过这恐怕是因为他们觉得广州对妇女和孩子而言太危险。

林则徐写了四条谕帖，张贴在中和行的墙上：

一、论天理……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雷霆风暴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前任大班喇咈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嘊唠啤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嘐嗌死于自刎……天朝之不可违如是，尔等可不懔惧乎？

一、论国法……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若贩卖鸦片，真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一、论人情……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即断了鸦片一物……尔等仍可致富……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

物中之银朱、藤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

一、论事势……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即里闬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

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

这些理论说辞，想必林则徐在从北京赶赴广州的途中就已经反复斟酌过。不过，真正起作用的不是谕帖中的这些道理，而是包围夷馆这一行动所造成的现实压力。夷馆中的水和食物储存不足，结合律劳卑事件的情况，我们不难想象，一旦被包围，里面的人将一筹莫展。

进入夷馆不过四十八小时，义律就不得不屈服了。3月27日，义律发出信函，保证缴出英国人所拥有的全部鸦片。次日，他又发布公告，对缴出的鸦片数量进行了说明，即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

不过义律另有打算。义律令外国烟商直接交鸦片给他，而不是交给林则徐。然后，他再“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缴出鸦片。这一举措令贸易冲突变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冲突。

至此，林则徐才下令恢复夷馆的食物供给，但受雇者仍不得回夷馆，夷人也不得离开夷馆去澳门。

在真正交出鸦片之前，义律的保证不过是空口白话。

林则徐注重实践。在如何根除鸦片一事上，他曾建议应当分阶段进行。在此次缴获鸦片时，他也采用了这个办法。

交出数量达到清单上呈报数量的四分之一，则买办和仆役可返回夷馆；达到一半，则允许商人们乘坐舢板船来往；达到四分之三，则恢复贸易；全部交出，则一切恢复正常。

夷人每交出一箱鸦片，即可获得五斤茶叶作为奖励。

当时在广州，鸦片的批发价为每箱七八百圆，两万箱鸦片的总金额高达一千五百万圆。不过在印度，鸦片的批发价为每箱两百圆。加上运费，英商的实际损失约为五百万圆。

在两万多箱鸦片中，有七千箱属于怡和洋行；属于宝顺洋行的有一千七百箱，排第二位。

根据美国领事彼得·斯诺的报告，美国人并没有鸦片，帮英国人代卖的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都已悉数退还给义律。

烟深海国

二月二十六日，身在虎门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送来报告，称夷人已经用船把上缴的鸦片送来了。于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豫堃等人从广州乘船前往虎门检查。在林则徐乘坐的船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题有“烟深海国”四个字。

上缴的鸦片有箱装的，也有袋装的，分别是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和两千一百一十九袋，比义律申报的数量要多出一千多袋。除掉包装，这些鸦片净重为两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

装鸦片的箱子主要是用杧果木做成的，一百三十斤重的箱子，长约一米，宽和高各五十厘米。虎门偏僻，没有哪个仓库能够放下两万个这样的箱子。因此，人们只得在场地边建起坚固的木栅栏，盖上枯草，充当临时仓库。

场地周边戒备森严。负责督查的文官就有十二人，另有军官十人、士兵一百人昼夜巡逻。

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们从三月二十八日开始接收鸦片，至四月初六全部接收完毕，实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确实，做这件事不得不谨慎。道光皇帝身边有反对革新的权臣。稍有差池，他们就会借机打击。

将接收鸦片的地点选在虎门，一方面是因为它靠近伶仃洋，便于接收；另一方面是准备直接从水路将鸦片运到北京去。如果从陆路运送，不仅要雇用大量的夫役，在各地住宿时还需要大量护卫。而走水路就会方便很多，只需把船舱封严实。

林则徐把鸦片运往北京，是为了用实物向道光皇帝交差。两地相去甚远，快马加鞭也要跑二十天。广州的动静，稍有讹误，在北京是

很难查证的。因此，但凡重要的事情，还是要以实物为证。

但是御史邓瀛认为，将这么多鸦片运往北京，恐怕会引起整个京城的轰动，而且路途遥远，有被盗换的风险。因此，他提出反对意见。

道光皇帝听取了邓瀛的建议，而且他相信林则徐，因而在上谕中写道：“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他令林则徐就地处理鸦片，“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

林则徐收到道光皇帝的谕旨，立即与其他官员商讨如何处理鸦片。

上谕中说“销毁”，虽然这个词并不是特指“用火烧掉”，但确乎没有比火烧更好的方式了。这就是“化为灰烬”，使一切不复存在。

但是鸦片这个东西，用火烧后，鸦片的“残膏余沥”将渗入泥土中；若将泥土挖出水煮，则能再制出两三成的鸦片。对其性质进行深入了解就会发现，鸦片最忌盐和石灰。

因此，林则徐在虎门镇口海边挑选了一处稍高的地方，命人挖了两个大坑。这两个大坑，面积约五十平方米。

为了防止鸦片渗透入泥土中，用木板衬装大坑内壁，在坑底铺上石块，在面向大海的一侧建有闸门，另一侧则挖有水道。水经后方水道被引入池中后，林则徐命人向池中投入大量的盐，再从箱子中取出球形鸦片，将其切成四块，投入池中。

就这样，鸦片先在盐水池中浸泡半日，而后人们再将生石灰投入池中。池面上立刻烟雾升腾，看上去就像沸腾了一样。池上搭着木板，夫役站在木板上面，手拿长棍不停地搅拌，加速鸦片的溶解。之后，在退潮的时候，打开闸门，将池中的水放进海里，并用水清洗掉池壁和池底上的鸦片残渣。

两个池子轮流使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将鸦片悉数处理掉。

由于鸦片数量庞大，销毁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至五月十五日结束，中间只有五月初五端午节休息了一天。

按照道光皇帝的要求，销烟现场不仅要有高官亲临，还要让普通百姓也能围观；以官民共同见证的方式，代替了把鸦片运往北京的举措。

道光皇帝在谕旨中，还要求夷人“共见”。英国人自然不愿意看着自己的鸦片被销毁。美国人C.W.金谷倒是去了，还把见闻记录了下来。

这个金谷曾乘坐“莫利逊”号送还日本的漂流民。而“莫利逊”号正是被日本幕府所击退的那艘美国船[1]。而渡边华山因预告“莫利逊”号的到来，创作了《梦的故事》和《慎机论》，却将自己推进了死地。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清政府认为，收缴这种明文规定的违禁品是合法的；每上缴一箱鸦片就赏赐五斤茶叶，则体现了天朝的慷慨。而英国认为，这是在对英国国民及财产施压，因此极其愤怒。为了表达这种愤怒，义律命令英国人全部撤出夷馆。

若能让所有的外国人都离开广州，那是再好不过的。但义律是英国的官员，也只能以命令的形式强制要求本国人。

义律曾向美国商人代表欧立福特提出一起退出广州，但遭到了拒绝。

对美国人而言，广州的贸易大多由英国人掌控；现在英国人要走了，做生意的主导权就都落到了自己手里，何乐而不为呢？英国商人因义律有命令，不得不退出广州。不过只要美国人还留在广州，他们还是可以通过美国人来进行贸易。

尽管英国人都退出了广州，却没有出现义律想象的戏剧性的结果。英国奉行重商主义，重视国际贸易，英国商人退出广州实属无奈；而当时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就把国际贸易看成对夷人

的恩赐，认为没有国际贸易就没有纠纷，反而觉得义律的命令对自己有利。由此不难看出，两国观念差异之大。

---

[1] 1837年，美国要求和日本通商，将“莫利逊”号开到日本浦贺港，被日本幕府击退。

权臣在内

林则徐将自己到广州后所采取的措施、向公行和夷人发出的谕帖内容等，详细地上奏。道光皇帝朱批：“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但是皇帝身边的大臣不高兴了。有人开始找借口无事生非。

御史布际桐上奏：处理掉鸦片，让夷人出示保证书，无法真正根除鸦片；应当想出更有效的方式。这不过是他想要非难林则徐而已。

禁绝鸦片已然成为不可撼动的国策之一，朝廷已着手制定相关律法，但保守派仍千方百计找借口，企图为禁烟一事找到转圜的余地。

直隶总督琦善在奏疏中写道：“民命不可视为草菅！”意思是不应当把百姓的性命看作遍地生长的杂草。这话完全正确，但他只是为了反驳“吸食鸦片者死罪”这一规定。

琦善处处与林则徐作对。林则徐被革职后，他成了鸦片战争的“善后者”。他主张弛禁论，或者说“反严禁论”似乎更恰当。他曾在奏疏中提出，给吸食鸦片者定死罪，是“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琦善指出，剿灭普通叛乱，杀掉的反叛者也不过八千一万人；如果吸食鸦片就要被判死罪，那么就要屠戮几十万人。凶恶的民族，眼见要被处以死罪，必不能束手就擒，定聚众抗拒。且福建沿海好斗者居多，以死罪相迫，恐逃往海岛，与外夷相勾结。一旦天下大乱……

当时，道光皇帝正热衷于全面禁烟，当面泼冷水自然是不恰当的，但保守派还是费尽心机地做了能做的一切。

五月初五，时逢端午节，虎门销烟暂停一天。也就是在这一天，朝廷颁布了新的禁烟章程。这是以肃亲王为代表的严禁派提出的。

该章程[1]以黄爵滋的奏疏为基础，依据林则徐提出的办法而制定，共有三十九条，主要内容有：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在一年零六个月的限期中，吸食鸦片者也都将面临重罚。平民"拟杖流"；官员流放到新疆做苦役；兵丁发放到近边地区充军；宗室则送到盛京，有官职的革职，有爵位的削爵，且永不叙用。戒掉鸦片但仍持有鸦片的，杖责一百。官兵搜捕时，如遭到抵抗，格杀勿论……

这个章程可谓"史上最严"。颁布时，道光皇帝在谕旨中强调要"永远遵行"。他明确指出："朕唯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朕言出法随，绝不宽贷。"

但是，新的禁烟章程其中一条不免使人担忧。

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拏，不许旁人讦告。

有人或许会认为，由于新章程规定的刑罚过于严苛，这一条是为了慎重起见。但事实上，这是保守派相当巧妙地抵抗。当时，像宣南诗社这样的革新派团体刚刚兴起，为数不多。而大多数官吏终日无所事事，官官相护，贿赂成风。如果官员暗中捣鬼，禁烟章程很有可能变为一张废纸。

看似固若金汤的大堤，其实早已被蚁穴穿透。保守派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危机的到来而坐以待毙。

林则徐对此洞若观火。他投身于禁烟工作，凭借的不过是道光皇帝的支持。

完成销烟工作后，林则徐开始研究夷人和夷国的情况。在赶赴广州之前，他对外国人就有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接触外国人以后，他发现实际情况和自己先前的认识有出入。

林则徐住在越华书院中，在处理公务之余研究国外的情况。为了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他经常和公行成员、买办、通事等谈话，尤其

是公行总商伍绍荣。

林则徐还让袁德辉等懂英文的人做自己的幕僚，翻译外国侨民出版的刊物，如由传教士郭士立、裨治文等人主笔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和《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等。前者的中文版就是《澳门月报》，后者的中文版就是《四洲志》。

后来，林则徐左迁去新疆，将这些资料都交给了住在扬州的宣南诗社同人魏源。魏源就是根据《四洲志》写出了《海国图志》[2]。

有一则逸闻称，日本嘉永三年（1850年），《海国图志》通过中国的贸易船传到了长崎，其中一本被平户藩家老叶山高行所收藏。

吉田松阴来平户游玩时，无意间读到了这本书，深有所动。日本幕府末年的有志之士对外国的了解，很多都来自这本书。可以说林则徐是《海国图志》一书的资料搜集者。就这样，他与日本的历史产生了微妙的联系。

在交给魏源的众多资料中，包含了船炮模型图。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意识到了西洋武器之精妙强势。他命人购买英国船“甘米力治”号（“剑桥”号），想和水师提督关天培合力，以这艘船为仿造对象，推动水师装备的改善。这被认为是后来的洋务运动的萌芽。

---

[1] 即《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

[2] 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地和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

第七章 战火

驱逐

从九龙去香港，可以经过星渡码头；从该码头至半岛饭店一带，叫“尖沙咀”[1]。

尽管鸦片被没收并销毁了，但保证书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义律拒绝在保证书上签字，带着所有英国人撤往澳门。

这就意味着，英国商人来中国时乘坐的六十三艘英国船，也都从停泊处黄埔开到了虎门之外。这些都是木制帆船，虽然可以载重千吨，但也免不了摇晃颠簸。船员们因厌倦海上生活，不时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上岸。这些地方多是些贫困的渔村。由于语言不同，夷人与当地百姓往往会发生纠纷。

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咀的村民林维喜遭到醉酒夷人的棍棒殴打，翌日便不治身亡。清政府对已回澳门的义律提出引渡犯人的要求。这是一桩再明显不过的暴力事件，且目击者众多，义律却以“不知道犯人是谁”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他说道：“当时在九龙上岸的，除了英国的船员，还有美国的伙夫，为什么钦差大人唯独对英国人如此强硬？”林则徐回复道：“根据美国领事斯诺的报告，当日并没有在九龙上岸的美国船员。”

林则徐似乎对美国有些好感。他叫人翻译《中国丛报》。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到并非所有的夷人都赞成鸦片贸易，而这些反对者多

属于美国传教士。而且他要求夷人在保证书上签字，英国人因听从义律的命令，没有一个人提交的；而美国人都老老实实地签了字，继续在广州从事贸易。因此，当英国和美国说法出现分歧时，林则徐自然而然地选择听信美国。

有人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清政府的当权者闭目塞听、夜郎自大。其实并不尽然。英国人有很多践踏清政府的狂妄言行。例如在林维喜事件上，义律明明知道谁是犯人，却不愿意将其交给清政府。他回复澳门同知[2]蒋立昂：

查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嘴村居民一名被殴伤毙命。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发觉。

林则徐回复道：

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该国主远在数万里外，岂能谕令不准交犯？今以伊庇匿凶夷之咎，诿卸于其国主，则是诬罔不忠……

伊禀内虽云，查出凶犯，亦拟诛死，此乃毫无凭据之语，谁能信之？又云该罪犯不发觉，更属欺人之语。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况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

此时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插曲。

英国人撤出广州后，广州的医疗传道会便由美国医生彼得·帕克接手管理。在1839年7月的报告书上，附有一份病例，病历号为“六五六”，病人是“林则徐”，官职是“钦差大臣”。可见，这个人正是林则徐，而不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

病症是“疝气”。不过，林则徐只是口头询问有无良药，并未接受实际的诊治。帕克医生告诉他，对疝气无法用药治疗，可以使用疝气带。

事实上，林则徐去医院并不是为了治疗疝气，而是去请帕克翻译一本外文书的。这本书是《国际法》（Law of Nations），作者是瑞士法律专家埃尔默里克·德·滑达尔。帕克翻译了《国际法》的主要内容，给译文题为“各国禁律”，并交给了林则徐。

相比之下，义律的行为则显得狂妄傲慢，在当时的情形下，甚至可以说不可理喻。

保证书和林维喜被杀事件均未得到解决。于是，林则徐采取了在广州处理夷馆时相似的措施—— 不但禁止向留居在澳门的英国人提供食物，还命令中国的杂役、买办悉数退出商馆。

这涉及澳门的地位问题。澳门曾受葡萄牙殖民统治[3]，而在鸦片战争时，澳门的归属还没有这么清晰。

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明朝，但具体经过众说纷纭。有人说，葡萄牙人为了晒干船上被弄湿的货物，临时借用此地，后来却稀里糊涂地据为己有了。也有人说，葡萄牙人曾帮助官府剿灭海盗，明政府便特许他们在此居住，以示嘉奖与恩典。再后来，葡萄牙人多次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将澳门割让给自己，但都遭到了拒绝。

尽管如此，葡萄牙还是将澳门视为自己的殖民地，派出总督进行管理。而中国也同样派出官吏，即澳门同知，对自己的国土进行统治。由于并没有得到割让澳门的正式许可，因而对葡萄牙而言，在这里发生任何问题，都会招致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并未对清政府派出官吏统治澳门一事提出异议。同时，澳门同知素来收受贿赂，于是也默认了葡萄牙总督的存在。这就导致澳门成了一个奇特的地方—— 清朝和葡萄牙合作统治。与其说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毋宁说是“特别居住地”更恰当。

钦差大臣的命令，在澳门自然也是有效的。倘若葡萄牙方面以清政府“干涉内政”提出异议，那么其未得到许可而强占澳门的问题，就会立刻被摆上台面。这对其并没有好处。

以前律劳卑在澳门卧床之时，葡萄牙总督为了显示对英国的友好，曾命令澳门所有的教堂停止敲钟。这一次，他虽然有心保护英国人，却无法通过强硬的手段阻止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的断粮措施。

七月十六日，在林维喜被害近五十天后，葡萄牙总督终于通知义律：“我们已无力保证诸位的安全。”

七月十八日，在澳门的英国人不得不撤离。然而失去了澳门这个避难所，他们无处可去，只能上船。英国人从广州被驱逐时只有男人，而这次还有女人和孩子。

根据《中国丛报》报道，为了安全撤离澳门，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抑或小孩，都慌张地奔向本国船只，载满了人的小艇、纵帆船，组成小船队，缓缓离开港口。那情景简直叫人不忍直视。

---

[1] 尖沙咀，也作尖沙嘴。

[2] 全称广州府澳门海防军民同知，清代负责管理澳门洋人，及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海防的正五品官员。

[3] 作者写作本书时，澳门尚未回归。

从九龙炮击到穿鼻之战

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下令，禁止沿海村民给英国人提供食物。

义律在船上写了一封抗议信，交给在海上巡逻的清朝水师。大意是：我以和平与正义之声抗议，数千英国国民在此遭遇断粮对待。若该状态持续下去，显而易见，今后将纷争不断，届时后果自负。

据说，从澳门被赶到船上的英国人有数千人。这似有夸大之嫌，但若算上水手，应当确有不少人。

给义律壮胆的，是“窝拉疑”号（Volage）的出现。这艘英国军舰装备了二十八门大炮。递交抗议信五小时后，“窝拉疑”号及英国武装商船，在距离尖沙咀十千米的九龙洋面上，向清朝兵船开炮。

两名清军士兵丧命。英国方面四人受伤，无人死亡，舰船受损轻微。

这次攻击带有恐吓的性质。炮击之后，英国人获得食物变得容易多了。渔民们划着小船来出售食物，价格略高于平时。环境越是危险恶劣，价格越是不菲。“略高于平时”，说明向英国船只提供食物并非凶险之事。这就是义律的盘算—— 通过威吓，使百姓恐惧而听自己的话。

而清政府则认为，过分地逼迫英国人，有可能会使其破罐子破摔，因而默认了渔民们提供食物的举动。《孙子兵法》说：“围师必阙。”意思就是彻底包围是不明智的，应给敌人留一条退路。

这次炮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英国方面一达到威吓的目的，立马联系澳门的葡萄牙总督，请其向清政府的官员解释——此次炮击是为了获得食物，实乃不得已之举，英国仍是希冀和平的。

撤离广州不久，英国方面就不断向澳门同知哭诉：“我们在海面上挨饿！”林则徐曾经由澳门同知给予回复：“我们并没有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是你们自己要走；这才导致英国人在海上挨饿。”

义律不肯出示保证不携带鸦片的保证书，英国商人无法去广州交易，只好把货物托付给美国等国的商船，才能勉强继续贸易。美国船先把停在海上的英国船上的货物运到广州，然后载着茶叶和丝绸等货物返回，每吨货物的运费高达三十至四十圆。香港和广州之间的距离很近。这样高的运费，实际上超出了从美国旧金山到广州的运费，因而美国人喜出望外。当时，从伦敦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广州，需要耗费数月，每吨货物的运费为十二英镑，即五十五圆。看着美国人大发横财，英国人自然相当恼火。义律此举渐渐招致了英国人的不满。

九月初九，从孟买出发的英国船“汤姆士·葛”号载着棉花，到达澳门。“汤姆士·葛”号的船长瓦拉相当老练，而货主达尼尔曾担任过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早就知道了广州发生的事情。一到澳门，他们就偷偷在保证书上签了字，立马就把船开进了广州。

这个时候，英国人已经获准返回澳门，中英关系暂时缓和。除了打死林维喜的犯人和保证书这两件事，并没有出现新的难题，并且双方达成了一个折中协议，英国人可在虎门外进行贸易。

清政府要求，英国在提交保证书后才能来广州贸易。而英国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表示不去广州，而在澳门进行贸易。最终，双方协定将贸易地点定在了虎门外这一中间地区。不管在哪个时代，当出现特别麻烦的问题时，似乎都倾向于折中。

然而，当“汤姆士·葛”号进入广州后，清朝方面突然通知英国人，取消虎门外贸易，并且要求刚返回澳门的英国人再次离开。在清政府看来，“汤姆士·葛”号私自签字一事，无疑表明义律的领导力正在减弱；此时把英国人赶到海上，英商必将逼迫义律在保证书上签字。因此，清政府态度强硬起来。

然而，义律并未做出让步。因为继“窝拉疑”号之后，又有装备着二十门大炮的“海阿新”号开来。他觉察到是“汤姆士·葛”号的举动使得清政府态度转变，因此绝不允许出现第二艘“汤姆士·葛”号。

九月末，英国船“罗伊亚·撒克逊”号装载着大米从爪哇开来。鉴于“汤姆士·葛”号的先例，船长塔温兹想越过义律，直接前去广州，以省下请人代运的高额运费。他悄悄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从澳门同知处获得了进入广州的通行证。他从澳门出航，先假装前往尖沙咀，那是英国船的停泊处，但半路上，他却掉头去了虎门。

义律发现情况有变，立刻登上“窝拉疑”号追击“叛船”，新来的“海阿新”号也随后跟上，并在穿鼻洋追上了“罗伊亚·撒克逊”号。塔温兹无奈地掉转船头。

尽管此前发生了九龙海战，但之后形势略有好转。义律因此认定，走出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他写了一封信给清政府官员，要求清政府方面停止对英国的敌对行为，让英国人能够在陆地上安心生活。和九龙海战前一样，递交书信是炮击的前奏。他在信中还要求清朝兵船“后退至沙角”。如果“得不到诚意的答复”，英国方面就有理由开炮。

身在别国，竟要求对方的海军后退。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清政府方面当然不会接受。于是，“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开炮。

清朝督战的是水师提督关天培。他乘坐的兵船，装备了葡萄牙制造的三千斤大炮。此次海战比发生在九龙洋面上的炮战更加激烈。很多人认为，穿鼻海战是鸦片战争的起点。

炮战持续了两个小时，“窝拉疑”号舰首和帆樯有较大的损毁，连舰旗都被击落了。“海阿新”号跟在其后，所受的损伤并不大。清朝出动的二十九只兵船，几乎都有损毁，据说战斗结束后，只有三只兵船还能勉强开动。

林则徐向朝廷报告，这次海战赢了。

事实上，清军士兵阵亡十五人，说“赢了”有些言过其实，应该说是迫使敌人撤退了。而从英国方面看来，这不过是意味着战斗结束。不过，林则徐在奏折中写道：“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由此可见战斗之艰苦。

北京和伦敦的强硬态度

11月3日，穿鼻海战爆发。次日，英国武装船队向官涌炮台开炮；8日又发起袭击，一百多名水兵分乘小艇，登陆后又很快撤退；11日和13日夜里再次对清军进行炮击。这之后，小规模战斗不断。

义律在等待援兵，林则徐则在增强要塞、炮台以及兵船。

在近现代的战争中，不乏指挥官无视中央意图的例子，如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但在鸦片战争时，无论是清朝还是英国，中央的态度都比现场指挥官更加强硬。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通信，前线要与后方联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并且，指挥官大多会夸大功绩，遮掩败绩。例如，在穿鼻海战中，清朝方面损失惨重，但送到北京的却是捷报。同样，在关于九龙海战的奏折中也不乏彰显兵士英勇之句：

击翻双桅夷船一只，在漩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

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毙夷人多名……夷尸随潮漂淌……

但事实上，英国方面并没有人员死亡。就连小规模的官涌之战，奏报的也是：“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

总之，道光皇帝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朱批：“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

“孟浪”即鲁莽、胡来之意，“畏葸”即害怕之意。这意味着，道光皇帝准许林则徐等人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英国。同时，他下令永远断绝与英国的贸易：“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意思很明白：就算现在英国愿意签署保证书和交出犯人，大清都不再理会。

在北京，顺天府尹曾望颜提出“封关禁海”，希望道光皇帝能下令禁止同外国通商，实行彻底的闭关自守政策。对此，身在广州的林则徐等人指出，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商人都已上交了保证书，应当给予优待，提倡刚柔兼济，反对闭关自守。

以道光皇帝为首，在北京的官员们不了解广州的形势，也无法体会当地官员的甘苦。

英国方面亦如此。义律在送往英国的报告中，为了凸显自己的艰苦处境，大肆夸张清朝官吏不讲道理、凶残暴躁；说英国人的财产被剥夺，生命遭受威胁；哭诉女王陛下的臣民正在清朝遭受侮辱。伦敦看到这样的报告，态度自然渐渐强硬起来。

林则徐绝非不讲道理、凶残暴躁之人。清朝对于抓获的夷人，只要是查明其与鸦片贸易无关，就会立即释放。

英国人吉布里因行船至铜鼓湾而被清朝兵船抓获；在释放他时，林则徐特意指定让“罗伊亚·撒克逊”号来接走—— 这艘船的船长塔温兹背着义律提交了保证书，但在前往广州的半路上被英国军舰追上而未能成行。如今，因为有了林则徐的这道指令，这艘船终于进入了广州，尽管方式有些奇怪。

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文字比语言更加抽象，何况是经过修饰的，而公文更是不可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事实。北京和伦敦具有最终决定权。两者的对立比林则徐和义律在现场的对立，更为尖锐。

在北京，极端的“攘夷论”盛行一时。大臣们看到传来的奏报皆是胜利，尽管认为其中必有不实，但久而久之，也渐渐深信“我军精锐”了，无不认为“战必胜”。而且，对北京来说，广州乃遥远的边境之地，即便发生战争也难以波及北京。这也使得身在北京的官员们能够无所顾忌地主张“强硬论”。

而在伦敦，被驱逐出广州的鸦片商人渣甸、马地臣等人四处活动，要求外交大臣巴麦尊惩罚清朝。根据英国政府收集的情报，清军

不堪一击，海军实力更是可以忽略不计。长期在中国居住的传教士郭士立寄去报告，以夸张的文笔写道："英国的一艘护卫舰，可以击溃清朝的一千只兵船。"

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出兵。当时的首相是威廉·兰姆。同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军费支出，其中赞成二百七十一票，反对二百六十二票，仅差九票。

以下是投赞成票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的观点。他素有"饶舌的麦考莱"之称。他在议会发表演说：

商馆遭包围，义律先生命人在阳台上高高挂起英国国旗……看到这面国旗，人们濒死之心亦能立刻苏醒。因为这让他们想起了自己所属的国家，是一个从来不知失败、投降和屈辱为何物的国家……是在普拉西原野上为布拉克大厅牺牲者复仇的国家，是自从伟大的摄政宣誓要使英国人的名字比曾经的罗马市民更受人尊重以来便不知后退的国家！他们虽然遭遇敌人的包围，又被大洋和陆地阻断了一切支援，但他们明白，加害自己的人，就算只是动一根毫毛，都必将遭到惩罚。

该演说充满了霸权主义的味道。对此，保守党的詹姆士·古拉哈姆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批判。他认为这是不义之战，即便胜利也没有任何光荣可言。另一位战争的反对者古拉多斯通也进行了演说，指出：

我从不知道，也从未在任何一本书中看到过这样的非正义战争。这将永远成为不名誉之战。刚才一位和我意见相反的绅士说道，在广东飘扬着光荣的英国国旗。可是，这面旗子却是为了保护臭名昭著的违禁品走私而飘扬的。如果现在要让中国沿海升起这样的旗子，我们只需看一眼，都不能不感到恐怖战栗。

英国的动员令

印度总督奥克兰向英军下达了动员令。其中包括驻锡兰的爱尔兰第十八团、驻加尔各答的步兵第二十六团、驻孟加拉的两个工兵连，以及驻马德拉斯的两个炮兵连，兵力共计四千。

以下是驻印度的东方舰队远征军构成：

旗舰“威里士厘”号（Wellesley） 火炮七十四门

“康威”号 （Conway） 火炮二十八门

“鳄鱼”号 （Alligator） 火炮二十八门

“巡洋”号 （Cruizer） 火炮十八门

“阿尔吉林”号 （Algrine） 火炮十门

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船有“阿特兰特”号（Atalanta）、“皇后”号（Queen）、“马答加斯加”号（Madagascar）、“进取”号（Enterprise）。从英国本土派出的军舰有装备四十四门大炮的“布郎底”号（Blonde）和装备二十门大炮的“卑拉底士”号（Pylades）。从开普敦派出的军舰有“麦尔威厘”号（Melville）、“摩底士底”号（Modeste）和“哥伦拜恩”号（Columbine），分别装备大炮七十四门、二十门、十八门。之后，英国又派出装备七十四门大炮的“伯兰汉”号（Blenheim）。

除了原有的“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这两艘军舰，装备四十四门大炮的“都鲁壹”号（Druid）赶在远征军到达之前抵达广东。

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他是查理·义律的堂兄。而查理·义律任副使。英国政府或许觉得这样安排有助于协作，但事实上，这对堂兄弟关系很糟糕。

第八章 为了鸦片

远征军北上

对于战争的经过，此处不做详细叙述。英国远征军拥有坚固的舰船，且受过严格的训练。对比之下，清朝的陆海军就有些相形见绌。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所有人都认为英国远征军首先进攻的必然是广州。事实上英军只对那里进行了封锁。其主力只是经过广州，开往舟山。

英国民众的财产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女王陛下的官员遭到侮辱，所以英国要报复清朝。这就是此次开战的理由。而上述“暴行”直指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广州高官，那么为何英国远征军要避开广州呢？

这是因为林则徐加固了广州的防御。一旦开战，首战尤其重要。为了不挫伤己方军队的士气，自然要选择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

英国远征军舰队司令官伯麦准将给舟山群岛定海县知县送去了劝降书。当然，他的劝降被拒绝了。

定海守军两千人，几乎是用冷兵器和英军战斗。定海总兵张朝发身负重伤，被部下用门板抬着撤退，数日后身亡。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定海。在定海道头洋炮台，英军看到大炮上的铭文——“Richard Philip 1601”（制造者姓名和制造年代），得知炮龄已有二百四十年，因而吹起了口哨。

定海知县姚怀祥，字斯征，福建侯官县人[1]，和林则徐是同乡。他随守军、百姓一并逃跑，可惜当英军逼近城门时，他还没有跑出城，后来在城北的普陀寺投水而死。

欧洲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在长长的一系列插曲中，这只是最初的插曲。它在英国人心中引发的感叹，混合着尊敬与轻蔑。"自此之后的鸦片战争中，可以说充满了这种牺牲精神的抵抗，这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正是基督教徒难以理解的—— 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的恩赐。事实上，即便撤退也未必就会遭到极刑。在鸦片战争中不乏败退的将领，被处以死刑的只有浙江提督余步云。因此，牺牲并非是因为害怕刑罚。

英国远征军避开广州北上。从北京来看，定海比广州要近，且扼住了中国的粮仓—— 江南—— 的入口。英军从这里北上，很容易就能到达北京。若大型舰队出现在天津大沽口的洋面上，道光皇帝恐怕会坐立不安，听从身边权臣的意见。因此，英国舰队离开广州三天后，林则徐就和巡抚怡良联名给北京送去奏折。大意是：英国人或许是想到天津要求开放通商。他们长期沐浴皇恩，不至于做出暴乱之事……应该以怀柔之礼相待，令直隶总督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从北方送回英国夷官阿美士德的前例行事即可。林则徐认为提前告知皇帝，令其有心理准备，或许能减少道光皇帝的动摇。

果然如林则徐猜测那样，英军占领舟山后，一部分舰船很快开始北上。

7月28日，懿律少将登上旗舰"威里士厘"号，率领"布朗底"号、"窝拉疑"号、"卑拉底士"号以及"摩底士底"号，向天津白河河口进发。除了上述五艘军舰，一同北上的还有轮船"马答加斯加"号，以及运输船"阿纳德"号、"达毕德"号、"马尔科尔姆"号等。

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洋面，道光皇帝和大臣们果然都慌了。他们本以为，与外夷之争是广州的事，没想到夷人竟开着军舰跑到自己跟前了！

天津属直隶管辖。因此，直隶总督琦善负责与两个义（懿）律进行交涉。琦善和军机大臣穆彰阿是保守派的代表。他十分懊恼，恐怕少不了抱怨：“当初弛禁论若是赢了，又何来这些麻烦！”

终究是实力决定一切。清朝已经不敢再坚持“天朝大官不与夷人平起平坐”的规矩了。不仅如此，在弄清琦善是否有资格代表清政府之前，英国全权代表懿律少将并没有出面，而是派义律上校去谈判。

英国人向直隶总督递交了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要求清政府：赔偿在广州被钦差大臣没收和销毁的鸦片价款；就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所受之侮辱进行谢罪，并保证下不为例；指定沿海一个或数个岛屿作为英国人居住和进行贸易活动的场所；偿还公行商人欠英国商人的债务，等等。

琦善道：“这些事发生在广州，还是去广州谈判吧！”于是，谈判地点改为广州。

道光皇帝已经动摇，在权臣的游说下，将林则徐革职。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犯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㖣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此次夷各处禀帖，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所其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加惩处，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

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英国人正式提出要求之前，琦善就把林则徐被革职一事告知了对方。因此，赴广东谈判的钦差大臣，自然是琦善。

之后，两江总督伊里布和义律签署了停战协定。

伊里布的执事张喜把林则徐被革职一事告诉了伯麦准将，还说“庆贺之至”。他本以为，林则徐没收了英国人的鸦片，英国人一定会痛恨林则徐。

但是伯麦准将说：“林则徐先生是个有才干和勇气的总督，只可惜不懂外国的情形。”

林则徐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人，反而受到英国人的尊敬。而那些对英国人阿谀奉承之人，虽对英国人有利，但也为英国人所蔑视。

11月初，停战协定签订后，以“麦尔威厘”号为旗舰的英国舰队南下。

---

[1] 1913年，闽县、侯官县合并为闽侯县。

重返广东

琦善一到广东，就颠覆了林则徐以前的措施。他解散了林则徐和关天培组织的水勇。而被遣散的水勇为了混口饭吃，重新当起了鸦片走私的搬运工和保镖，后来又被英军雇用并役使。他们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倘若琦善没有下令解散水勇，他们将在各个要塞和兵船上，向英军开炮，而不是受雇于英军。此外，琦善还彻底清除了漂浮在水面上的船筏。这些船筏原本是用来阻碍英舰进攻的。广东的守军也从一万人被裁减为八千人，而且大部分兵力被撤到广州附近，只留两千人在虎门等地。

琦善一味地取悦英国，试图以此推动谈判顺利进行。但是英国人不买账，毫不留情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大意如下：

一、就英国人所受的侮辱赔礼道歉，并保证下不为例。

二、赔偿没收的鸦片价款以及此次远征的费用。

三、由官宪保证清还公行所欠的债务。

四、不得因外洋鸦片走私而累及英国人和英国船。

五、固定进出口税，不得随意增减。

六、贸易商船费用繁杂且过重，予以减轻。

七、英国人的递禀可以不经过地方官宪而直接呈给皇帝。

八、在福建、浙江、江苏、直隶[1]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通商港口。

九、在北京设立使馆，在各通商港口派驻领事。

十、在通商港口开辟与澳门一样的外国人居住地。

十一、外国人居住地允许英国人的家属居住。

十二、若英国人在通商港口触犯法律，则由英国官员审判，清朝官宪不得干预。

十三、通商港口可设立教堂。

十四、废除公行制度，即便不废除，也不得增减目前的行商。

十五、割让一处岛屿或通商港口给英国，且英国拥有特别司法权。

这无异于要清朝全面投降。负责和英国人交涉的是琦善，但他几乎把所有事宜都委托给了一个名叫鲍鹏的人。这个人会英文，买办出身。他曾受雇于英商，自然入不了英方的眼。鲍鹏把英方要求的鸦片赔偿款由两千万圆压到了六百万圆。他因此得意扬扬，毫无尊严可言。

关于割让领土的部分，琦善恳求英方能将“明割”变成“暗割”，即不必写成文字让皇帝知道，但义律不同意。他坚持以条约的形式加以明确；倘若模棱两可，外交大臣巴麦尊必定会大发雷霆。

当时的清朝，无论是政界还是社会，都对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趋之若鹜，所以琦善才会提出这种不合常理的请求。但是在外交场合，英方显然无法理解和接受此种做法。

英国舰队离开天津后，清政府又变得强硬起来。而被派往广东的琦善并不了解北京的情况，对英方一味让步，卑躬屈膝。他在奏折中写道：除了广州，是否还能增开福州、厦门两处港口？至于英方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他已经拒绝了。尽管如此，道光皇帝还是对英方的无礼要求而大动肝火，批示：愤恨之外，无可再谕。

“谕”是“教诲”之意。这是当时的外交用语。因清政府视英国人为“蛮夷”，故用“谕”。道光皇帝的意思是：岂有此理，不必再“谕”英国人了。也就是说，谈判中止。

义律也明白，无论是明确地要求清朝割地，还是其他条款，都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同意。他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因此，他从一开始谈判，就没有诚意，不过是为己方争取备战时间。

也就在此时，义律和懿律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11月底，懿律借口生病，返回英国。

1841年1月7日，英军以己方的要求被拒绝为由进攻广东。首个进攻目标是夹着虎门第一关口水道的阵地——东边的沙角和西边的大角岛。这两个阵地很快便陷落了。清军副将陈连升阵亡。沙角原本有两千守军，但被琦善削减到了六百人，连原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而英国的登陆兵力为一千四百六十一，由伯拉特少校指挥，且炮兵也投入了战斗。当然，在海上的英国军舰为掩护英军登陆，提供了炮火支援。

此次战斗，英方只有三十八人负伤，无人战死。中方负伤四百六十三人，战死二百九十二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实力悬殊的战斗。

义律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六年多，始终以实现中英通商正常化为目标。他认为不能过于逼迫清朝方面。显然，在这一点上，他和堂兄的意见是对立的—— 懿律少将则把打击和惩罚作为重点。

义律上校向清朝方面许诺：第一，归还舟山群岛；第二，从占领的沙角炮台撤兵。他将此作为对琦善的“回礼”。他觉得，这样一来，琦善对皇帝多少能有个交代。

道光皇帝看到琦善在奏折中提到要将香港“澳门化”时，心中怒火万丈。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澳门？太不像话！与此同时，身在伦敦的巴麦尊读了义律上校的报告，也是拍案而起：归还舟山？太不像话！

琦善口头答应了英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包括割让香港。英军因此停止了进攻。眼看着就要签字，琦善却又开始拖延起来，毕竟事关重大。2月12日，距离正式签字的日期没有几天了，但琦善尚未得到朝廷的批复。义律早已探知了这一消息。在等待签字的这段时间里，他并不是在准备纸笔，而是在准备战斗。他觉得必须给清朝继续施加压力。

2月26日，英国远征军没有等到琦善的答复，于是对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发起进攻。这里只有两百名守军。英军一进攻，守军就溃逃了。据英国方面的资料记载，在这场战斗中，清军战死者并不多，但其中包括关天培。关天培曾向广州求援，但琦善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

[1] 直隶省简称“直”，省城为保定。明朝时称北直隶，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称直隶，康熙八年（1669年）称直隶省。1928年6月20日，经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决定，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

南方与北方

琦善欺瞒道光皇帝之举终究还是暴露了，因而被贬职。朝廷派出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以及湖南提督杨芳来接替琦善。

杨芳是一名勇猛的老将，身经百战。道光元年（1820年），杨芳调任直隶提督。

杨芳听说英军炮击相当准确，有如神助，在惊讶之余，与巫师商量对策。巫师认为，敌阵中必定有人会使用妖术，因此要破除其妖术。“外夷的妖术，最忌讳的是妇女的尿。想要克敌制胜，可用妇女的尿桶。将尿桶盖打开，桶口正对敌船，妖术自可破。尿桶多多益善。”

所以杨芳到达广州以后，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当然，尿桶对于战斗，不可能有任何帮助。

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命他去浙江。5月24日，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军再次发动进攻。

此时，广州驻扎着四万清军，但他们只会欺压百姓，掠夺钱财。英军越来越接近广州城，然而清军却在与百姓相互厮杀。

英军主力从泥城杀往四方炮台，手段相当残暴。《广东军务记》记载：

夫罹殃而妻受辱，两命皆亡，子被缚而母困居，身家俱殒。而且田园被伤，室庐被毁，丘垄被掘，老少被淫，贫者室如悬罄，富者家徒壁立，洵属鬼神积愤，草木含愁。

清军根本没有和英军作战。都查院御史曹履泰上奏弹劾清军将领：“由泥城而上四方炮台……凡所经由之地曾无一人施放枪炮者，而民已不服矣。”

广州城危在旦夕。中英两国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和议。这就是《广州和约》，主要内容有：

一、奕山、隆文和杨芳，以及外省军队在六日内，撤到广州城外六十英里处。

二、清政府支付英军六百万圆，其中一百万圆在27日日落之前交付，剩余部分在一周内交付。

三、赔款付清后，英军退到虎门外，并将占领的各个要塞归还清朝。但是，在两国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清朝不得在这些要塞设防。

四、赔偿英国商馆和西班牙帆船“米巴音奴”号的损失。

五、奕山委任广州知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

这无异于要清朝无条件投降，奕山却悉数同意了。至于赎城费用，由公行成员筹措二百万圆，其余的从布政使、盐运使和粤海关的公库中支取。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此事是如何向朝廷奏报的：广东天气炎热，士兵病倒甚多，因而移驻广州城外十余里的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

竟然这样谎报，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官兵不作战，但百姓都憎恨英军的暴虐行径，以锄头、铁锹、棍棒等作为武器，纷纷起来战斗。广州两万男女老幼打出“平英团”的旗帜。檄文写道：

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唛斩首于南岸。

在三元里，平英团包围了马德拉斯第三十七步兵团等一千名英军。当时天降暴雨，英军的火熥枪无法使用。尽管在十年前，英军就开始装备燧发枪，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入侵长江流域，才从印度得到大量新式枪械补给。因此，英军在三元里使用的大多是火熥枪。

就在此时，广州知府却跑来威胁道：“如果平英团不解除对英军的包围，六百万圆的赎城费，就由三元里的百姓出！”

平英团的旗帜倒下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伦敦决定解除义律的职务，原因主要是义律答应把舟山还给清朝。其实经过专家的调研，舟山无论是地理还是气候，都不适合当作贸易基地。

义律早已知道这一情况，因而自以为用“无用之地”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交易。他远离英国六年半，周围都是商人，似乎把商人的利益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了。但对巴麦尊而言，作为外交大臣，国家荣誉高于实际利益。

亨利·璞鼎查接替义律，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他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占领舟山。

英国舰队又开始进攻，占领了厦门。或许是为了避开台风，直到9月26日，英国舰队才抵达舟山。

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伊里布被革职，由以勇猛著称的蒙古人裕谦接任。浙江提督是余步云。他本是一名普通的士卒，却幸运地一步步爬上了提督的位子。然而，无论是勇猛还是幸运，在英国远征军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未能产生丝毫的作用。

英军占领定海之后又占领镇海，逼近宁波城。

余步云弃城而逃。裕谦在镇海城外的学宫池投水自尽，但被部下救起，用门板抬着逃跑时死了。清军重整旗鼓，进行全面反击。可惜反击仍是一败涂地。

英军放弃了宁波，退出镇海，改组远征军，而后进军乍浦城。乍浦守军的将领是副都统长喜。他也和裕谦一样，试图投水自尽，却被部下救起，后来逃到嘉兴时死了。

在乍浦，最令人心酸的是妇女的殉难。《壬寅乍浦殉难录》一书，列出了很多死者的姓名，其中有被英军所逼、从楼上跳入水中溺

死的寡妇，有为免遭敌人凌辱而跳井的年轻女子。英军占领乍浦五天，其间几乎一刻也未停止掠夺和施暴。

英军最终攻陷吴淞要塞。江南提督陈化成壮烈牺牲。两江总督牛鉴收拾残兵向后撤退。

英军沿着长江而上，向南京的大门—— 镇江发起了进攻。英军有七千人，而镇江的守军只有四百人—— 驻防旗兵和绿营兵各两百。在本国领土上打仗，守兵却没有敌兵多，岂不怪哉！

英军冲进镇江，将镇江变成了淫掠的地狱。据《出围城记》记载：“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该书还列出了民间女性死者的姓名，多达七十五人。至于被杀害的人，更不知是多少。

镇江沦陷后，道光皇帝也不得不批准和议。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中英双方签订了《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该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清政府向英国赔偿二千一百万圆，同时废除须经公行进行贸易的制度。

该条约还规定清政府释放英国俘虏以及因同英国有往来而被捕的中国人。另外，还有关于关税的条款。

次年，中英双方又在虎门签订了《虎门条约》，对治外法权及其他事项进行了说明。

不义之战

在日本高级中学的世界史教科书中，关于鸦片战争，有这样的论述：为了打破清朝不正常的贸易形式，英国以英国商人的鸦片被焚毁为由而对清朝宣战。

只能通过公行进行贸易，这种形式或许确实不正常，但鸦片战争的真正目的，真的是为了打破这种贸易形式吗？鸦片被没收是否只是借口？事实上，迫使清朝承认鸦片贸易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而打破不正常的贸易形式，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英国对清政府开战，是看重了中国廉价的原料，迫切想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扭转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的逆差。一旦打赢战争，中国势必是一个理想的产品倾销地。虎门销烟只是战争的导火索，并不是根本原因。

一国采取什么样的贸易形式，是根据该国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外国不应该通过武力来干涉。英国的那些“爱国”的历史学家或许是这样认为的：武力干涉外国的贸易形式已经是不义之举，但和为了鸦片而战相比，程度稍稍轻一些，因而歪曲事实以掩盖战争的真正目的。日本编写教材的人可能在无意间采用了这一说法，这点很重要，必须要讲清楚。

公行的垄断制度，缩小了清朝对外贸易的窗口，这对英国来说固然有诸多不便，但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六年前，英国的对华贸易，采取的不也是由东印度公司垄断这一不正常的形式吗？

清朝方面并没有反对通商，即便是在英国人退出广州后，林则徐等人也仍以谕帖苦口婆心地劝说：只是不允许鸦片，其他的商品还是可以自由贸易。

虽说公行制度有所不便，但至少仍有商谈的余地。而且，就算拓宽了贸易渠道，贸易量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因为清朝需要的外国商品是有限的。换言之，仅仅为了打破贸易形式就派出远征军，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义律不允许英国国民保证“不带进鸦片”，正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打消过要把鸦片带进中国的念头。孟加拉的财政状况堪忧，鸦片收入可以说甚于救命。如果中国不买鸦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就会动摇。英国为鸦片而战，这是势在必行的。

当时已经出现了为这场不义之战进行辩护的言论。众所周知的《中国丛报》的撰稿人，例如马礼逊，他的文章中就存在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中英两国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是鸦片贸易，而是清政府傲慢的中华独尊思想与英国人进步的自由精神之间的矛盾。他显然是在偷梁换柱。英国议会同意支出战争费用，绝不只是为了打破中华思想。议员们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英国国民的财产—— 鸦片—— 被没收，他们为此愤慨。无论如何，鸦片战争是为了鸦片而发起的战争，至于中华思想受到打击，或公行垄断的不正常贸易形式被打破，这些都是战争结果，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

当时，英国正值受到工业革命洗礼、国家繁荣的维多利亚王朝，而中国则是忙不迭地收拾乾隆盛世残局、处于衰世的道光王朝，这样的两国交战，讽刺意味十足。

道光皇帝是清朝最为节俭的一位皇帝，在他的谥号中，也被冠以“俭勤”二字。

英军第一次进攻舟山群岛时，定海守军只有两千人。作为海防要地，此处原本有一万多驻军，但因厉行“节俭”，被大幅裁减。由于军饷低，守军平日还要从事木工、瓦工或者酿酒等副业，因此，这是一支“半工半军”的队伍。

懿律和义律把军舰开到天津大沽口的洋面上时，清廷大惊失色，道光皇帝那么轻易就动摇，不是没有原因的—— 天津的守军只有八百

人，而且很多在看守库房、监狱和城池，有的在做传令杂役，实际战斗兵力只有六百人。天津紧挨着北京，一旦在天津开战，北京也就完了。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或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朝廷才会裁减天津的兵力吧。

林则徐没收了英国商人的两万箱鸦片，每箱奖励五斤茶叶，关于这件事，林则徐在奏文中特别提到，这笔款项是自己筹措的，以便让道光皇帝安心。如果从国库支出，哪怕只是一两银子，道光皇帝都会不高兴。

在广州缔结停战协定时，清廷本来应当加强军备，以防敌人再次来犯，然而道光皇帝首先发出的命令却是：裁撤防兵，节约奢费。两江总督裕谦听闻英军窥视浙江，恳求暂缓裁军，道光皇帝却用歪理驳回了他的请求：如果英国真有这样的企图，怎么会提前泄露机密，从而传到你的耳朵里呢?

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恹恹无生气”，根本无力与工业文明的大英帝国相匹敌。中国的有识之士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也是没有办法的。譬如林则徐，他是到广州赴任之后，才大量吸收外国的信息，从而得以理解问题的严重性。也因此，他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文学素养高的魏源，劝其写下和外国相关的著述。

林则徐遭遇流放，从浙江前往新疆的途中，曾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7月）见过魏源一次。当时英军已经撤离舟山，舞台再次转至广州，英军正在上演的一幕丑剧是更换全权代表。翌年，英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进攻华中。魏源所在的扬州也是一片混乱。扬州在镇江的对岸，镇江经历了一场惨不忍睹的战斗，幸好战火没有烧到扬州。有人说，扬州没有遭到进攻，是因为扬州的商人向英军支付了“赎城金”。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英军打进镇江之后，打算进攻南京，扬州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从军翻译马礼逊开口要六十万圆“赎城金”。扬州商人讨价还价，同意支付一半。反正无论如何都是白赚的，马礼逊也同意了。

签订《南京条约》那年的十二月，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那些渴望了解国外状况的知识分子而言，这部著作成为唯一的参考资料。日本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据说这部作品传到日本之后，数年间，刊刻便达二十余种。这是一部宝贵的著作，将东亚有识之士的目光引向了海外。

第九章 三棱镜时代

星斗南

鸦片战争的点火者是主张严禁论的黄爵滋，而真正站在第一战线的则是林则徐。林则徐被贬后，在扬州拜访魏源，将自己在广州收集的资料交给他。这些逸闻很具象征性，林则徐把黄爵滋提出的问题和现实联系起来，魏源又使其传于后世。宣南诗社的成员们就像在进行一场接力。

1841年9月，龚自珍在丹阳突然离世。有传言说他是被毒死的。他以诗人的直觉，预感到了时代危机。他的死仿佛是在表明，他已经完成了预言家的任务。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鸦片战争以及战后的现实。

鸦片战争时期，台湾兵备道是姚莹。道光十一年（1831年）宣南诗社恢复时，此人不在北京，因而没有参加。但从思想和人际关系上来看，他应当被视为宣南诗社系统中人。他和林则徐的诗友张维屏以及被称为“狂士”的张际亮等人关系密切，和黄爵滋更是亲密的盟友。

姚莹是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比林则徐早三年中进士，可惜仕途并不顺利。林则徐前后被任命为巡抚、总督，而姚莹却只是台湾兵备道。当时，台湾归福建省管辖，尽管他是台湾的民政长官，但与按察使同级，在巡抚之下。

英军计划的进攻路线中并未包括台湾，但台风把这场战争与台湾联系了起来。1841年9月，时值英国舰队占领厦门又从厦门撤退后不久，英国运输船“纳勃达”号在基隆洋面遭遇海难。除了船长，船上还有两名航海士、一名事务长、十七名第五十五团的白人士兵、一百七十名印度随军杂役，以及七十名印度水手。船上的小艇都被海浪冲走或破坏了，只有一艘能使用。船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白人士兵共二十一人，扔下印度人，坐上这艘小艇逃走了。

被遗弃的二百四十名印度人，大多被淹死了；而游到岸上的，有的被守卫炮台的清军杀死；有一百三十三人成了俘虏，最后只有一百一十四人活着。

清廷谕旨传来了：对所有俘虏进行审讯和录口供，之后，头目暂且关押，其余人等一律正法，以抒积愤。

当时英军的残暴行径已传遍全国，中国人民无不感到悲愤。

除了九个头目，其余的俘虏都被斩首。

第二年三月，英国三桅船“安”号在台湾洋面上遇难；在上岸的五十七人中，四十四人被斩首。

后来在南京媾和时，这些事再次被提起。英国方面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处分，北京朝廷于是派了总督怡良去台湾调查，结果发现英国船并不是被击沉的，而是触礁沉没的。台湾兵备道姚莹被捕，原因是他奏报作假。不过，在“纳勃达”号触礁沉没之前，基隆炮台肯定对其开过炮。该调查是在媾和之后，自然有英国方面的压力，怡良也要考虑不能影响到媾和大局。

此外，各地的高官都败给了英军，大家觉得既然如此，干脆无一例外都打了败仗也好。这样就可以说，英军有着“不可抗拒的实力”。要是有人打了胜仗，这就说不通了。也正是如此，姚莹等人一直受到其他地方官员的嫉妒。怡良当然不得不考虑和这些同僚之间的利害关系。

事实上，姚莹并不想不加区别地将夷人全部处死。同年十月，洋面上漂流着二十五名英国平民，姚莹把他们救起后就都释放了。在他的观念中，未参与战争的人是无辜的。

姚莹在牢房里待了六天，出狱后再次被起用。这实际上也说明，对英国船进行炮击确有其事，且对他的处分是出于政治目的。

姚莹被捕时，其好友张际亮表示，自己愿意“与公共患难”，甚至带病来到了北京。姚莹被释放后，张际亮兴奋至极，一杯接一杯地痛饮庆贺，最后烂醉而死。这似乎印证了他是人们所说的“狂士”。身在新疆的林则徐听说张际亮的死讯，曾作诗哀悼。

前面数次提到的这些进步人士，可以说是“维持现状派”，他们因为自身的某些局限，还没有达到反对传统体制的地步。其中或许有一两人存在民族主义的反体制思想—— 反清。但若真要推翻中华传统的礼教体制，这些人恐怕仍会站在“守旧”的一派。鸦片战争结束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当时仍在世的宣南诗社成员中，并没有人投奔太平军。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林则徐被重新启用，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镇压广西的农民起义。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病死在广东潮州的普宁行馆，享年六十六岁。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皇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据说林则徐临死前，指天大喊了三声“星斗南”。这成了一个谜，没有人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渔翁得利

我们来简单地谈一谈美国的态度。

在这场鸦片战争中，美国一直都采取观望政策。这主要是因为波士顿等地的美国商人和船主持观望态度，并且美国驻英公使埃瓦涅德从英国得到保证—— 美国可以和自己共享战胜中国获得的成果。

美国以保护在华美国人以及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为名，命令劳伦斯·卡里提督率领东印度舰队开赴广州。1842年4月，舰队到达广州，且在中国沿海待了整整一年。对于保护在华美国人这一点，这支舰队可以说相当积极；但至于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恐怕不过是个幌子。而且，星条旗事实上成了鸦片贸易唯一的保护伞。卡里提督在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禁止美国人违反清朝的法律、从事鸦片贸易—— 这支舰队用中文到处宣传这一目的，从而使得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好感。

在英国人为非作歹之际，美国人极力将自己伪装成了乖孩子。

鸦片战争之后，美国官员还邀请广州的清政府官员去军舰上参观。水师提督吴建勋参观结束后，美国人还送了他一艘小艇和一本美国地图。

吴建勋将此事奏报给了朝廷，使得清政府也对美国产生了好感。

前面已经说过，林则徐在广州任职期间，曾命人翻译外国报纸，积极地研究。

当时在《中国丛报》和《广州纪事报》等报纸上，反对鸦片贸易的主要就是美籍传教士。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办报已经接近二百种，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外国传教士主办。

林则徐下令禁烟时，美商虽然不愿上缴鸦片，但是为了其在华利益，最终只能不顾英国立场，公开发布禁止鸦片的通知，由此赢得清政府信任。美国获得“美船驶入内河”的特别优待，成为当时赚钱最多的外商。

义律带领所有英国人撤离广州时，美国人并没有一同撤离，而是留在了广州。凡此种种，使得林则徐对美国人也产生了好感。虎门销烟时，他甚至邀请了美国商人金谷等前往现场观看。

1844年7月，清政府与美国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望厦条约》，这是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为美国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美国把自己打扮成好孩子，通过《望厦条约》获得的成果，几乎和英国用军舰大炮获得的成果一样。

林则徐最初注意到英美之间的矛盾，曾想过“以夷制夷”的策略。

但对美国而言，英国获利越多，自己也就获利越多，因此，美国实际上是希望看到战争扩大和清政府彻底被打败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并非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获得成功。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两件事的起始时间分别是1840年和1850年[1]，阳历正好是整数。按照清朝的年号来说，分别是道光二十年和道光三十年，也是整数。

按照日本的年号，鸦片战争发生在天保十一年。就在前一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被捕入狱。这就是所谓的“蛮社之狱”[2]。1844年，高野长英因监狱失火而暂时被释放，之后一直没有被抓回去，他在外躲藏了几年。1850年，他被幕府官吏包围，自尽而亡。顺便说一下，也是在这一年，众所周知的国定忠治在田部井村名主家被关东取缔出役逮捕，之后他被处以“磔刑”，享年四十一岁。

现在流行“鸽派”“鹰派”的分类法，和“灵活”或“强硬”，以及“现实”或“非现实”的简单分类并不完全一致。通过蛮干来强硬地推行灵活的政治路线。而强硬政策在不少情况下也是最现实的。简单粗暴的分类法不可取。当代流行的文化人类学对分类问题也相当热情。通过分类，事情变得简单易懂。对尚未有任何标签、像白纸一样的人而言，对其进行分类似乎很有用。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这一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进行分类，并非难事。极端地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保守派”和“变革派”。而在十年后的太平天国时代，对历史人物的分类就没那么轻松了。

十年之间，人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时代变得更加复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鸦片战争只是近代的起始点，而太平天国已经深入近代之中。入口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可走进去之后，却是个迷宫。而鸦片战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比较清晰。

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鸦片战争的部分容易处理，太平天国的部分就比较麻烦了。我的《鸦片战争》这部小说已经写完很久了，而《太平天国》[3]目前尚未动笔。这有为我自己的工作辩解的嫌疑，不过从1840年到1850年，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能对这十年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太平天国》恐怕一个字也写不成。

鸦片战争时期，有识之士心中无不存有一种漠然的悲哀之感。

这是一种在走下坡路的时代的悲哀之感。

这是一种社会将越来越糟糕的悲哀之感。

龚自珍说："无福见乾隆之春。"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1661~1722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期间（1735~1795年），被认为是清朝的黄金时代。对龚自珍所属的士大夫阶层而言，是"小民沐浴圣泽"的时代。不过，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开始，朝政纲纪混乱，已经很难说是"盛世"了。即便被称为明君，一旦上了年纪，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在全盛时期，乾隆能做的都做了，包括一些并不能完全胜任的事。比如，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尽管彰显了国威，却给子孙留下了后患。

乾隆皇帝退位后的半个多世纪，清朝无疑从鼎盛开始走了下坡路。有识之士深知这一点，心中自然产生了悲哀之感。

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

若不能了解其原因，定会产生茫然之感。

当时，欧洲工业革命的余波正涌向亚洲，列强正推行各自的世界经略。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外流，实际赋税加重，使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外来势力"所致。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了解，因此不断地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个人在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外来的势力"之前，看世界的眼光没有掺杂额外的东西，对世事反而容易理解。而一旦意识到"外来势力"的存在，这个人就像戴上了三棱镜，世界变得复杂起来了。

在鸦片战争之前，所谓的“外来势力”，是从长城那边闯进来的野蛮的“武力”。没有人会想过，中国会被另一种文明压迫。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希望能够对现状进行变革。“衰世感”无处不在，不能让国家一直往下滑，否则将掉进无底深渊。一定要改革，扭转不容乐观的现状。

但是有人很害怕改变现状。这些人一般都生活优越，希望目前的状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不用说，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官员有很多这样的“维持现状派”。尽管他们是少数派，但统治着整个中国。国家发生任何微小的变革，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对走钢索的人而言，一丝微风都足以使其心惊胆战。何况这些人眼下正处于是否从空中钢索上掉下来的危急关头，光顾着担忧自己的身家性命，自然顾不上担忧“衰世”的问题。

世道走下坡。面对这一现象，有人忧心忡忡，有人事不关己。这便是差别。

林则徐是一个责任感极强的高官，他有着足够的资质充当改革派的首领。在他担任江苏省巡抚期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商船曾违反禁令，开到上海。这成了林则徐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契机。

“阿美士德”号很快驶离了上海，并未惹出麻烦。之后，他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去广州禁烟。他的责任心如此之强，自然会对外国的情况做深入研究。他努力收集各类资料，在与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了那股“外来势力”。

当然，林则徐对外国的理解仍有其局限性。他生活于封建礼教制度之中，有些地方无法理解，有些地方理解错误。但就当时而言，他对外国的理解已经算是相当深刻了。

先对外国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再采取强硬的措施，并不矛盾。姑且不论胜负，重要的是向外国人显示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抵抗精神。

如果打仗，现状就必然会得到改变。因此，“维持现状派”拼命策划停战，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朝廷中，尤其是位居高位的大臣—— 军

机大臣穆彰阿—— 是狂热的维持现状派。他对林则徐采取的强硬政策深感不安。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被解除职务，理由是：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严重的事态……

林则徐被贬职，不，是遭到了流放。流放地是新疆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林则徐被流放，三月到达洛阳；四月达到西安时，林则徐得病；病愈之后，林则徐七月从西安出发，十二月到达目的地。1846年，林则徐接任陕甘总督一职。

流放新疆期间，林则徐仍关注着对外问题。他潜心研究新疆的历史，写了《俄罗斯国纪要》一书。根据《国朝先正事略》所载，有人担心中国遭西洋的侵略，向林则徐讨教对策。林则徐回答："西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祸患，是俄罗斯。我已经老了，但你们将有机会见证。"这是否算得上未卜先知姑且不论，但至少证明即便林则徐被流放边疆，仍对涉外问题保持着关切。

夹在两次战争中的这十年，前五年，林则徐是在贬谪与流放中度过的；后五年，则是在复职任陕甘总督中度过的。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的舞台上被拉下来以后，林则徐本以为不会再有机会露面。他在新疆时刻了一方图章，上面有"宠辱皆忘"四个字。言外之意是，过去的事情恍如一场梦，对未来也不抱有任何希冀。

不过，他还是重新被起用了。时局要求他这样的人出马。他责任心强，也无法拒绝国家交给他的任务。

毕竟林则徐已年过六十。有些病痛在年轻时不觉得，现在却令林则徐痛苦。尤其是任云贵总督期间，夫人去世—— 他十四岁订婚，二十岁迎娶—— 给他的精神带来沉痛的打击。他的夫人郑淑卿，想来是一位能干的女子。

林则徐在夫人去世后，1849年，他提出因病引退的请求，并获得了朝廷的批准。这一年，他离开昆明，在南昌的百花洲疗养。1850

年，林则徐回到故乡福州。上次回乡是他的父亲去世时，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了福州。新皇帝决定起用林则徐，恐怕是想将其任命为军机大臣，以便留在身边共商国是。但林则徐以生病为由，推辞上京。

根据福建巡抚的奏折，当时林则徐患有疝气，稍稍疲劳便会发作，发作时两腿胀痛异常，不能跪拜，甚至无法下床……他面容憔悴，不过言语精神尚且健爽。尽管福建巡抚在奏折中说林则徐一旦治愈疝气就上京，但事实上他本人并没有再次担当大任的打算。

林则徐有三个儿子。女儿普晴的丈夫沈葆桢也是个难得的人才。此外，前一年在湘江有过交谈的左宗棠，看起来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想起这些年轻人，林则徐就不免发出“时代是年轻人的，我该退场了”的感慨。

福建的高官拜访这位老前辈时，总是恭维道：“国家还需要林公这样的人才。”而林则徐也总是回答：“如果真的需要我，那就说明国家正处于可叹的状态。不应该啊，那可真是事态严重了。”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真的发生了严重的事情。

“拜上帝会”在广西发动叛乱，首领是洪秀全。关于此，之后会时不时地提到，这里先重点谈一谈晚年的林则徐。

由于当时交通和通信都相当不便，消息的传递十分滞后，并时常出现讹误。尤其是地方叛乱，地方官员会有意识地遏制消息上传，以避免自己被贴上“治理不善”的罪责。

广西巡抚郑祖琛和广西提督闵正凤一味掩盖太平天国之事。而事情之所以会败露，是因为广西的富豪派人去北京陈诉。他们担心自己的财富受损，希望朝廷能用强硬的手段来对待“造反者”。可是地方为了自己的政绩，佯装不知，蒙混过关。

朝廷由此得知叛乱一事，但因是乡绅的一面之词，在尚未摸清详细情况之前，决定先更换广西提督。

湖南提督向荣接任广西提督。他被誉为“最英勇”的猛将。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被派遣支援广西。

地方乡绅竟然排除艰难跑去北京诉苦，可见广西的叛乱已经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在出大乱子的时候，皇帝需要挑选可以委以重任的人物，授予其“钦差大臣”的关防。

咸丰皇帝想起了林则徐：“听说他在福州城中。福州离广西不远，且镇压如此大的叛乱，需要像鸦片战争时那样的果断。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这个钦差大臣。”

就这样，尽管林则徐年事已高，还身患宿疾，却在1850年9月，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从福州去广西所花的时间，比从北京去广西少一个多月。咸丰皇帝对自己的决定甚为满意，自认为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人。而且林则徐在广西的邻省当过云贵总督。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广西的叛乱很快就发展成了太平天国的“大乱”，但林则徐最初接到的消息是：“本地人与客家人在广西对峙。”

“若是此类纠纷，我还是有些经验的，必会处理妥善。”林则徐大概是这么想的。

在中国南方，从北方迁居过去的人被称为客家人，在很多方面会受到不一样的对待。本地人不希望客家人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促使客家人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越是受到不同对待，客家人就越团结。客家人吃苦耐劳。因为他们都知道，要吃饭就必须勤快。

在客家人中，出了不少革命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客家人，后来的孙文也是客家人。

“最后一次为国效力。”林则徐这么想着，接受了此次重任。他的疝气已经痊愈，却患上了严重的痔瘘。可在这个时候，他不能推三阻四。

接待北京来使的次日，林则徐就离开福州，前往广西。这是道光三十年十月的事。

和日本不同，在清代，皇帝驾崩的当年，仍使用原来的年号，次年才改成新年号。因此，道光皇帝虽已驾崩，但年号仍使用的是“道光三十年”。

在路上，林则徐患了严重的痢疾，也有可能是赤痢。这极大地消耗了他原本久病初愈的身体。当时，他已经六十六岁。

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在普宁逝世。

潮州民众哀悼这位鸦片战争的英雄，“罢市巷哭”。他们关闭店铺，穿上丧服。据说每天有数千人前去叩拜吊唁。

恐怕临死之前，林则徐都认为自己能解决好广西的“纠纷”。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那不过是“新旧居民之间的斗争”，最多也就是反叛者把外来的基督教作为凝聚人心的纽带而已。

鸦片战争十年后的林则徐，可以说是一个吃了禁果的人。对他的理解，已不像当初在虎门销烟时那样简单了。倘若他能够直面太平天国，或许还能通过其态度，抓住一些线索来分析当时的他。可惜林则徐未到广西就去世了。当时他的状态也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前文已经提到过，英国林德奈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林则徐给洪秀全写过一封劝降书，但洪秀全的回信言辞激烈。

仔细分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林则徐在十月初接到钦差大臣的委任状，而洪秀全在金田起兵时已是十二月初十，那时林则徐已经去世了。

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开始称天王，此后才正式发布文书。

“假设”是历史学的忌讳，但人们还是想知道，假设林则徐当时没有死，他多活了几年，作为钦差大臣围剿太平天国，那将会是怎样的光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在潮州死去，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幸运。鸦片战争的侵略者是英国，敢和英国作战的林则徐是民族英雄。

太平天国是被压迫阶级发起的起义，是一次贫苦的劳动者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曾率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都是有军功的人。如果林则徐没有死，恐怕他也会站在统治者一边，从而进入镇压革命者的名单。

太平天国延续了十五年。

清朝已经没落，但仍有着强大的势力和权威。与各地昙花一现的暴动相比，太平天国能够持续对抗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太平天国一边进攻，一边壮大队伍。在清王朝看来，未能在其起兵时就给予彻底的打击，给自己留下了十五年的罪受。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时刻，先后有三位高官死去，清王朝恐怕只得哀叹自己时运不济。姑且不说其他两位，单是林则徐一人的死，对清王朝而言，就是莫大的憾事。

在考察鸦片战争时，如果不加注意，或许会疏忽掉清政府是否善战这个重要问题。对此，不同的人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广州的官员做到了齐心协力，不曾反目。这一点，是所有人都必须予以承认的。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在清朝的官僚制度中，始终贯穿着“相互监督”这一条暗线。例如，在尚书的任命上，满人和汉人各一名，管辖同一个行政机构，其目的就是相互监督。侍郎也有左侍郎和右侍郎，满人和汉人各两名，一共是四名。曾国藩就是礼部右侍郎。

地方长官只有一人，但仍受到监督制度的约束。以道光三十年为例：广东巡抚是叶名琛，广西巡抚是郑祖琛，另外还有管辖这两个省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这三个职位是对等的，原则是“会同”，也就是协同工作。这实际上仍是一种相互监督。

由此可以看出，官僚之间反目成仇是相当自然的，而齐心协力反而是例外。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时，两广总督是邓廷桢，广东巡抚是怡良，粤海关监督是豫堃，广东水师提督是关天培。要知道，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都是满人，而邓廷桢曾赞成弛禁论。他们尽管意见各异，但能够步调一致，同仇敌忾，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在很早之前拍过电影《林则徐》，豫堃被设定为投降派的领头。但事实上，林则徐在离开广州时，曾把行李寄存在豫堃那里。此前，两人也曾相互和诗。可见二人非但没有反目，而且关系甚好。后来电影剧本出版时，附上了电影拍摄的历程，其中就提及，由于找不到突出的“坏人”和林则徐对立，就把豫堃“拉来”了。

广州官员之所以没有反目，或许有林则徐的功劳。他似乎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道光皇帝，都对他心悦诚服。他诚恳、无私，亦不死板，有着诗人的胸怀和永不枯竭的风趣。地方官员都是林则徐的崇拜者。因此即便是在流放期间，林则徐也仍受到礼遇。

当时，林则徐已死。但两广总督徐广缙不知道这件事，还给皇帝上奏折：广西巡抚郑祖琛只知道粉饰太平，且年老多病，无法管理部下，应当革职，由钦差大臣林则徐兼任广西巡抚。

林则徐死后不久，前云南提督张必禄在广西浔州病死，也有人说是战死。

张必禄是一员老将，士卒出身，历经百战，出生年月不详。有记载称，嘉庆元年（1796年），他作为乡勇参加了征讨四川、湖南的“教匪”之乱。这一年距他去世已有五十四年。张必禄当乡勇时是二十岁，1851年8月，张必禄去世。就当时人的平均寿命而言，这算是长寿了。

中国人素有敬老的传统。老人说的话，就算不乐意，也得硬着头皮听着。

或许是为了防止官员之间反目，朝廷才任命这样的老将。但遗憾的是，张必禄死了。

之后，前两江总督李星沅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接替林则徐。道光末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周天爵接任广西巡抚。

李星沅和徐广缙素有嫌隙。周天爵力挺徐广缙。而广西提督向荣和周天爵不睦。从湖南派来的军队不服从向荣之子继雄的命令，在战斗中消极应付，企图让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承担失败的责任。向荣忍无可忍，用四川兵替换了湖南兵。向荣是四川人。他只有兵权。而军粮、辎重等则由地方调拨。于是，周天爵及其后台徐广缙以断绝粮草供应来抑制白荣。可以说，李星沅的处境非常艰难。最后，他不得不向朝廷哀求再特派一位“总统将军”。

朝廷派出了大学士赛尚阿，并严厉地谕示李星沅、周天爵和向荣：虽特派一人，但你们也不能就此当甩手掌柜。

李星沅写信给向荣，建议要“异姓同心，无分彼此，以期和衷共济”。与其说这是建议，毋宁说是哀求。

在赛尚阿到任之前，李星沅就病死在广西的武宣。因此，赛尚阿接任了钦差大臣一职。

正因清朝官员彼此钩心斗角，太平天国才得以发展壮大。如果林则徐没有死，或许官员之间不至于如此反目，洪秀全等人的举事也不会如此顺利。诚然，仅凭林则徐一人，无法改变历史的滚滚洪流。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是被后人崇拜的对象。这恐怕还要感谢命运的安排，没有让他和太平天国产生过多的交集。

此外需要提一下，林则徐也是一名水利工程专家。在流放新疆期间，他奉命在当地监督开垦工作，实际上是指兴修水利工程。从绿洲或天山山脚下等有水的地方，修建相互连通的竖井和暗渠，将水引至缺水的地方。这些井被称为“坎儿井”。

当然，这是古有之法，并非林则徐的发明。但是新疆人称之为“林公井”。可见当时林则徐一定组织人力建造了很多这样的井。事实上，在去新疆之前，林则徐还曾奉命监督黄河的修复工程。他在鸦片战争中的突出作用，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但我们不能忘记。

[1] 这里指1850年末。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集团，发起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

[2] 指日本天保十年（1839年）江户幕府为了维护锁国政策，镇压渡边华山等进步学者的事件。

[3] 目前，作者的长篇历史小说《太平天国》已经在日本出版，其中文版为《太平天国兴亡录》。